

## 關於「反右」起因的若干疑點與商榷 ——1956至1958年中共政局再思考\*

李福鐘\*\*

2007年是「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祭，在這場堪稱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政治浩劫中，中共官方承認至少有55萬人遭到了程度不一的各種整肅與迫害，輕者懲戒降級，重者交付勞改，甚至有至家破人亡者。然而反右究竟因何而起？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何以非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步入社會主義階段之際，發動這麼一場對知識分子心靈與肉體的雙重迫害？動機始終令人費解。

對於在意識形態上素來即與共產黨站在對立面的反共人士而言，反右適足以說明共產黨的殘暴與善變，因此中共會發動反右似乎成了一件不證自明的事情，其動機簡言之即是「陰謀」。這種歷史觀的缺點是過於簡化共產黨內的決策過程，無法針對反右前後中共內部複雜的政局得出相對應而合理的解釋。北京權力核心內部實際發生的事情，遠比簡單的陰謀論複雜多了。

---

\* 本文在審查修改過程中，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使論證與內容方面得以更為嚴謹周延，謹此致謝。當然本文一切的文責與錯誤，無疑仍由作者自負。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至於遂行迫害的主謀——中國共產黨，則有另一套完全相反的解釋，中共官方指控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率先「猖狂進攻」，共產黨才不得不起而反擊。本文稱之為「反擊說」。

然而真相究竟如何？本文企圖指出「反擊說」的諸多疑點，證明至少最高決策者毛澤東完全沒有被迫「反擊」的壓力。同時，本文進一步說明在反右發生前夕，毛澤東與共產黨內其他高層領導人之間，其實存在著複雜而微妙的權力摩擦，毛澤東企圖掌控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主導權，然而黨內其他人則有不同的想法。本文認為，就是因為這種權力的摩擦，導致毛澤東以發動反右來扭轉黨的政策路線。

依照這樣的解釋，反右之所以發生，與知識分子的激烈「鳴放」是否威脅到共產黨政權的穩定，其實一點也不相干。反右的真正原因，肇因於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55萬受害的知識分子，只不過是毛澤東為獨佔黨內決策主導權，而製造出的犧牲品。

**關鍵詞：**反右、毛澤東、反擊說、大鳴大放

1957年由毛澤東所發動的「反右派鬥爭」，<sup>1</sup>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一場政治浩劫，總計被戴上「右派」帽子而遭到迫害的人，至少有55萬之眾，<sup>2</sup>而且，這個數字尚不包括受到牽連的受害者家屬。更何況，55萬只是中共官方願意承認的說法，實際罹禍的人數，從來就沒有確切的統計。作家丁抒在其關於反右運動的論著中，認為全部右派人數至少應在100萬以上；<sup>3</sup>而2006年1月香港政論雜誌《爭鳴》則披露，根據最新解密的中共內部檔案，右派分子人數其實高達317萬8,470人，此外尚有143萬7562人被劃為「中右」，兩者相加，總數超過461萬人！<sup>4</sup>

一場反右運動究竟整了多少人？答案之所以眾說紛紜，原因之一是1980年經過中共最高當局定案的數字「55萬2,877人」，<sup>5</sup>其實只是1978年以後獲得「改正」<sup>6</sup>的公職人員數目，不包括某些至今仍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右派，亦不包括未納入「國家幹部」行列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人士，以及難以估算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內控」的右派。<sup>7</sup>上引《爭鳴》雜誌所披露的數字或許尚無其他證據足供佐證，而且根據中共當局的統計數字，1956年全中國在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衛生、文化藝術五個方面的知識分子人數，總共不過384萬，<sup>8</sup>《爭鳴》聲稱右

<sup>1</sup> 反右派鬥爭，一般簡稱為「反右鬥爭」或「反右」，亦有稱為「反右運動」者。本文出於行文上的方便，幾種說法均予穿插採用。

<sup>2</sup> 右派分子總數55萬餘人，這是中共官方1980年代以後的標準說法，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839。

<sup>3</sup> 丁抒，《陽謀——「反右」前後》（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3年增訂版），頁279-290。

<sup>4</sup> 羅冰，〈反右運動檔案解密——實劃右派3百多萬！〉，《爭鳴》（香港，2006.01），頁8-10。

<sup>5</sup> 「552877」這個數字，是中共1980年在處理右派分子「摘帽」問題時清查得到的數字，綜合參考葉永烈，《反右派始末》（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589-592；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新華出版社，1998），頁17；劉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長編·第二卷（1957-1965）》（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22。

<sup>6</sup> 反右鬥爭其實至今尚未獲得中共當局的「平反」，官方只承認「摘帽」和「改正」。關於這一點，參考葉永烈，《反右派始末》，頁589-590。

<sup>7</sup>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頁17-18。

<sup>8</sup> 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第8冊，頁18。

派分子高達 317 萬多人，佔當時知識分子總數的 82.5% 以上，比率未免過高。就算援引毛澤東 1957 年稱中國有「500 萬左右的知識分子」的說法，<sup>9</sup>317 萬的右派分子仍佔總數的 63.4%，比率還是偏高。無論如何，官方所願意承認的 55 萬人，顯然有刻意低估或隱瞞之嫌；至於百萬以上的說法，倒也未必誇大。

總而言之，反右運動對 1950 年代中國知識階層造成的傷害是有目共睹的，各種留下來的文獻記載、回憶錄、當事人的口述資料，在在說明著這場政治運動的荒誕與殘酷。然而事隔半個世紀，種種圍繞著反右運動的歷史謎團，並未完全獲得解答。或許是官方諱莫若深——反右鬥爭中某些不光彩的政策作為，顯然足以造成讓中共至今不願公開真相的實質動機；也或許是留下來的線索，仍不足以解開所有的疑點。總之，就如同「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人？」這個看似簡單、其實卻複雜無比的提問一樣，圍繞著反右運動亟待追根究底的疑惑，明顯還有許多。

而其中最令歷史家好奇，同時相信也是所有曾經在這場浩劫中滅頂的知識菁英們最百思不解的難題之一，就是：反右鬥爭究竟是不是「陽謀」？毛澤東究竟從什麼時候決定設下陷阱，「引蛇出洞」的？是從 1957 年 5 月 15 日毛將〈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於黨內秘密傳閱開始？還是 1956 年 11 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隔年要來一次黨內整風，心中就已經悄悄展開布局？或者，是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表明邀請「非黨員」參加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整風時，陷阱才架設好？

辯明這一點，有助於釐清反右前後籠罩著北京政壇的若干疑團，包括：(一)大鳴大放究竟是不是毛澤東「引蛇出洞」的伎倆？毛澤東鼓勵知識分子說出對共產黨執政的不滿，是否一開始便打算秋後算賬？(二)毛澤東獨排眾議，堅決號召所謂「開門整風」，卻又在不久後動員黨機器全力「反右」，將知識分子打倒在地，毛澤東究竟出於什麼動機？(三)1956 年夏秋之際，從 7

<sup>9</sup>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引文見《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5卷，頁404-405。

月北戴河會議到 9 月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八大」)，再到 1957 年 10 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否定八大決議有關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是否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齟齬？或者套用文革期間的術語，「兩條路線的鬥爭」此時是否已經形成？毛澤東與其他黨政高層官員的關係究竟如何？(四)毛澤東發動反右的目的是什麼？純粹爲了整肅知識分子？還是受匈牙利事件影響，決定主動出擊、防微杜漸？或是毛澤東另有其他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這些疑點的解開，對於正確理解 1956 年至 1958 年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局勢的演變，至關重大。由於這一時期中共高層的政治生態，直接影響了大躍進運動的產生，甚至於埋下了日後 1966 年代文化大革命發動的種籽。<sup>10</sup>因此不妨說，對於毛澤東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而言，1956 年至 1958 年北京政局檯面上與檯面下的若干關鍵事件，決定著此後長達 20 年的政治環境與集體命運，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本文將試圖進行三件工作：(一)先重新檢討圍繞在中共八大至 1957 年 5 月反右鬥爭前夕的若干疑點，以便對當今中共官方史學的解釋模式提出質疑；(二)接著嘗試釐清從 1956 年 6 月(劉少奇與周恩來主導的「反冒進」啟動)至 1958 年 6 月(毛澤東終於擺脫黨內阻力放手推動「大躍進」)之間，中共黨內對於社會主義建設路線方針的一場嚴重分歧；(三)最後提出一個可能比現行中共官方說法更條理一致的歷史解釋。

筆者認爲，關於中國共產黨在 1956 年至 1958 年間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在路線和理論方向上的這場嚴重分歧，至少起源於 1956 年 6 月的「反冒進」，結束於大躍進在 1960 年的徹底失敗。然而這還只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第一回合；路線鬥爭最後必須等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才真正分出勝負。而如果要在「反冒進」至「大躍進」之間找到一個脈絡清楚的歷史解釋，以

<sup>10</sup> Roderick MacFarquhar 在其探討文革起源的名著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中，便是以 1955 年夏秋至 1956 年上半年的第一次「冒進」，作為他整個文革起源論述的頭一起重大事件。

理解這段期間發生的諸多重大事件，尤其是大鳴大放與反右鬥爭究竟代表著什麼樣的政治涵義、牽動了什麼樣的高層情勢，那麼毛澤東的整個決策操作與心理動機，便成了極為關鍵的一把鎖鑰。毛澤東邀請黨外人士幫忙整風是不是「引蛇出洞」？他的動機何在？為什麼一開始信心滿滿，誇下海口：「共產黨有很高的威信」，「中國不會出匈牙利那樣的事情」，「不怕天下大亂。這個天下是亂不了的。」<sup>11</sup>結果過不了兩個月卻又聲稱必須反擊「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sup>12</sup>毛澤東真的因為聽了知識分子的批評而坐立不安，以至連他不久前才做過的保證都忘了？還是中間實在有太多疑問，以至於必須更加精密地檢視反右鬥爭發動前半年間毛澤東的言談舉止和他與黨內其他幹部的互動關係？

對於反右運動的歷史評價，以及它到底是不是一場「引蛇出洞」陰謀的問題，痛惡中國共產黨遂行政治迫害者，固然可以因毛澤東事後洋洋得意宣稱這是「陽謀」，進而指控整起事件從頭到尾就是坑人的把戲；<sup>13</sup>然而從事歷史學術研究卻是另一回事，無法如此輕下斷言。尤其，在當前中共官方史書仍斬釘截鐵宣稱反右鬥爭對於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必要」的時候。<sup>14</sup>

鄧小平 1980 年 3 月 19 日在指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sup>15</sup>如何起草時，便發表過如下的看法：

<sup>11</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上冊，頁649、684。

<sup>12</sup>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收在《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4-439。

<sup>13</sup> 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最值得一提的顯然是丁抒所寫的《陽謀——「反右」前後》一書。作者在書中尚稱詳實地將共產黨如何引誘知識分子發言並隨之進行迫害作了一定程度的描寫，只不過縱觀全書，不難發現對於毛澤東發動反右的動機、引蛇出洞開始的時間點，以及反右前後中共高層的動態等等，均語焉不詳。

<sup>14</sup> 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該研究室主任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是1990年代以來有關中共官方歷史論述相當具代表性的文本。書中對於反右鬥爭的評價，基本立場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中國，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黨的領導的右派分子確實存在。對右派的進攻堅決反擊，對反社會主義的思潮進行批判，在黨內和全國人民中間進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放棄這種鬥爭，……就會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亂。」見該書，頁358。

<sup>15</sup> 這個文件是1980年代中共當局採取改革開放路線之後，為了平息文化大革命以來有關黨的路線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sup>16</sup>

鄧小平的這一番話，強烈暗示著「反右」其實是資產階級右派先「殺氣騰騰」地對共產黨進攻、否定社會主義道路，才逼得共產黨不得不出手。如此一來反右就不太像是陰謀，而是「自衛」了。共產黨反右反得理直氣壯。

爭論焦點仍然集中在毛澤東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是在資產階級「猖狂進攻」之前？還是之後？之前，則反右果真如毛所說，是「陽謀」；若是之後，則毛澤東的「陽謀」說，充其量只是罡風砸地之餘的趾高氣揚罷了。

## 一、「反擊說」

「陽謀」一詞，源自於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所寫的一篇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發表於反右已如火如荼展開的1957年7月1日。這篇文章由於信手拈來處處迸射著對右派分子的反擊火力，因而留下了大量絕對稱得上「殺氣騰騰」的名句：

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麼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

---

的爭議，同時統一全黨對於某些歷史問題的觀點，而於1981年6月27日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重要文件。

<sup>16</sup>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卷，頁294。

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sup>17</sup>

既然連毛澤東自己都承認反右運動的發動是一場陽謀，那麼，能不能據以認定大鳴大放自一開始就是設好的陷阱？可惜沒有那麼簡單。正如上引鄧小平所斷言，如果共產黨不反擊，社會主義事業就無法繼續前進，這是目前中共官方對於反右歷史評價的標準說法。按照這種說法，毛澤東在 1956 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時，<sup>18</sup>是誠心誠意想放寬文藝界和學術界創作與研究的空間；而 1957 年 4 月底邀請黨外人士幫共產黨整風，也確實抱持著「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的期待。<sup>19</sup>誰叫黨外人士的批評太過激烈，以致於引起社會動盪，形成一股準備向共產黨奪權的態勢，最終共產黨不得不予以反擊。這是目前中共官方歷史論述中的標準說法，筆者姑且稱之為「反擊說」。

邏輯上，毛澤東洋洋自得地聲稱反右是「陽謀」，與反擊說並不衝突。毛澤東喜歡逞口舌之能，是人盡皆知的事，1957 年 7 月 1 日正是反右鬥爭高潮之際，毛澤東大刺刺這麼聲稱，不無張顯威風的企圖。<sup>20</sup>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企圖以結算黨的歷史問題的方式，為改革開放路線進行政策辯護。其中有關反右鬥爭的敘述只有一小段，而且正如上引鄧小平在起草過程

<sup>17</sup>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毛澤東選集》，第 5 卷，頁 436-437。

<sup>18</sup> 有關「雙百」方針的提出及其大致內容，可以參考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 410-441；或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 486-493。

<sup>19</sup> 1993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具名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編輯部」的《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一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便指控說：「有的人只看到整風運動轉變為反右派鬥爭的歷史表象，而對我們黨發動整風運動的初衷表示懷疑。有的別有用心的人則不顧歷史事實，誣蔑發動這場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是毛澤東的『大陰謀』。」見該書頁 59。言下之意，即整風的「初衷」是不容懷疑的，而反右完全不是「陰謀」。

<sup>20</sup> 曾經擔任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王若水，在其對反右運動的評述中，便認為毛澤東有關「陽謀」的說法只是一種「事後自圓其說」，他認為毛在提出雙百方針時，心中既無陰謀也無陽謀，而是確實想走一條與蘇聯不同的道路。見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年第 3 版），頁 275。



中所作指示：「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這份有關中共黨史的官方權威論述，自然對反右運動抱持著原則上正面的評價：

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sup>21</sup>

既然黨中央已經對反右運動定出了這樣一條底線，此後中共官方具有代表性的歷史論述，大抵均依循著此一格式，作進一步發揮。在所有曾經參與反右秘密決策的昔日中共領導官員中，最早公開談論反右來龍去脈的，應該是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他在 1986 年出版的回憶錄《回憶與研究》中，對於為何從一開始的「雙百方針」、「開門整風」，突然轉向對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展開反擊，作出了當事人的解釋，他說：

中央當時發動這一場鬥爭，有一個醞釀和發展的過程。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sup>22</sup>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五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覺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匯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志<sup>23</sup>對北大、清華有人主

<sup>21</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上冊，頁311。

<sup>22</sup> 這個系列的座談會係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出面召開，從1957年5月8日開始，到6月3日結束，共開會13次，有70多位非共產黨的各界極面人士受邀參加，目的在於鼓勵與會者響應「雙百方針」，提出對執政的共產黨的批評。參考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上冊，頁46-47。

<sup>23</sup> 蔣南翔當時是清華大學校長。

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著頭皮聽。當我匯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毛澤東同志……早在這年一月十八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sup>24</sup>他就著重考察分析了一年來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他說：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復辟？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sup>25</sup>

自李維漢公開了這段記述之後，有關毛澤東聽到羅隆基批評「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因而惱羞成怒，憤而發動反右的說法，便甚囂塵上。<sup>26</sup>

然而，毛澤東真的因為聽到口無遮攔的羅隆基的一句謗言，才突然 180 度轉變，從「放」改為「收」的嗎？

較為正式的官方表述，當然不會採用這麼戲劇性說法。即使是李維漢上述的回憶文字，重點也是擺在 5 月以來各種攻擊共產黨的言論傾巢而出，逼得中共最後不得不反擊。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薄一波，在其回憶錄中談到反右鬥爭時，立論亦不脫此一基調：

<sup>24</sup> 毛澤東1957年1月18日的這個講話，極可能是一窺反右之謎的重要關鍵，關於這一點，將於下文再作說明。

<sup>25</sup>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833-834。

<sup>26</sup> 例如曾在反右運動中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之後遭到勞教處分的朱正，在其研究反右運動的專著《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1）一書中，便持這種看法，見該書頁110-111。中央研究院陳永發院士在其《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一書中，亦接受此說，見該書下冊頁668。章詒和在紀念羅隆基的文章中，也提到了這一說法，並且認為毛澤東對此「勢必要記恨的。因為羅隆基這句政治話語，表達的卻是一種最深刻的文化歧視」。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322。

在整風初期，我們黨為了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誠心誠意地歡迎黨外人士幫助我們整風，虛心聽取他們的各種批評和意見。但是，不料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殺氣騰騰，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進攻，欺騙和煽動一部份人，掀起了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這種情況，是我們黨在決定開始整風時所沒有預料到的。<sup>27</sup>

既然一開始沒有預料到，情勢逆轉後的反擊，就變得不無三分道理了。薄一波的這些說法，基本上仍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進一步衍伸，亦即強調共產黨最後是被迫起而反擊，反右不是陽謀或陰謀，不是引蛇出洞，而是為了捍衛社會主義道路，不得不採取的斷然措施。

中共官方的這個論點，亦非遲至 1981 年發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出現，而是早在 1957 年開始發動反右鬥爭時，便已經這麼說了。這是共產黨師出有名的合理性基礎。雖然毛澤東揚揚得意宣稱「這是陽謀」，然而翻查反右運動期間中共連篇累牘的各種公開說法，無不堅決聲稱反右是為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是共產黨不得不採行的手段。例如由毛澤東親自授權主持反右鬥爭的鄧小平，在他於 1957 年 9 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便這麼說：

運動證明了：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城鄉各種反社會主義分子進行堅決鬥爭的必要性。他們對於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領導的進攻，是極為猖獗、極為狠毒的，他們是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的，他們的目的是要使資本主義和反動統治復辟。……

這次反右派鬥爭，主要是在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範圍內進行。這裡面包括工商業者、民主黨派、教育界、新聞出版界、文藝界、科學技術界、衛生界、國家機關的許多工作人員、大學生等。……「毒草」必須鋤掉。對於「毒草」的開放，是為了從反面教育群眾，為了鋤掉

<sup>27</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下卷，頁611-612。

可以作肥料……<sup>28</sup>

既然右派分子的進攻「極為猖獗」、「極為狠毒」，那麼把這些毒草鋤了當肥料，也就順天應人了。這是中共至今不願承認反右鬥爭在政策上犯錯，只願承認「錯在擴大化」的最根本理由。同時，對右派分子的「摘帽」只稱之為「改正」，而不是「平反」，原因亦在於此。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鄧小平這篇理應在其政治生涯中佔有相當分量的〈整風報告〉，最早曾大篇幅刊登在1957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報》1、2、3版上，然而等到1980年代編輯出版《鄧小平文選》時，卻將之放棄，並未放入其中。

如果鄧小平這篇〈整風報告〉對於中共「被迫還擊」的姿態還表達得不够清楚的話，那麼《人民日報》1957年6月22日的社論〈不平常的春天〉，無疑就直接了當得多了：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右派「鳴放」，意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推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既然如此，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就不能不堅決地進行反攻。有人說，黨不是在請別人幫助自己整風嗎，怎麼整到別人頭上來了呢？……大家看到，這一次鬥爭並不是工人階級挑動起來的。古人有云：樹欲靜而風不止。風為什麼不肯止呢？……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右派的知識分子，雖然也混在群眾中迎了新，送了舊，但是他們是並不同意的。他們既然不同意，他們的反社會主義的風就不能止。<sup>29</sup>

一句「這一次鬥爭並不是工人階級挑動起來的」，把不論是陰謀或是陽謀的指控統統擋了回去。明顯地，從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發動以來，中共官方的說法一直都是右派分子先猖狂進攻，共產黨才被迫還擊。

然而，實情果真如此嗎？

「反擊說」最讓人起疑的地方，在於毛澤東一開始邀請黨外人士參與共

<sup>28</sup> 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見學習雜誌編輯編，《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彙編（第一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上冊，頁270、272-273。

<sup>29</sup> 〈不平常的春天〉，《人民日報》，1957年6月22日，1版。

產黨的整風(即所謂「開門整風」)時，話說謙虛誠懇，姿態擺得夠低，甚至還當著黨外人士的面，數落黨內同志的不是。然而從態度極其懇切，轉變成為殺氣騰騰，卻只在短短數日之間，對於許多身歷其境的人來說，這是最難以置信的事。1957年當時擔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在反右鬥爭中被打為右派的李慎之，就不相信毛澤東會像李維漢所說的，是在聽了有關羅隆基的發言匯報後，才一怒發動反右。李慎之這麼認為：

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人物！……他怎麼能為羅隆基的一句「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就沈不住氣而龍顏大怒呢？毋寧說為大魚游入網內而高興的可能還更大些。毛主席是一個戰略家，正如陳毅在解放戰爭勝利前夕的詩裡所說「從來能兵觀遠略，於今籌畫賴雄才」，不論是對付國民黨的八百萬大軍，還是對付中國的五百萬知識分子，毛主席都是偉大的戰略家。<sup>30</sup>

不相信毛澤東會為了一己之私憤而大動干戈的恐怕還不只李慎之，在反右鬥爭中和羅隆基一起被打成「章羅聯盟」的章伯鈞，以一句話清楚地涵蓋了他毛澤東行事作風的理解，章伯鈞說：「老毛的動機從來不是出於私人的。」<sup>31</sup>言下之意，毛澤東不是那種會以個人恩怨或情緒起伏來作決策的人。就因為很難將毛的決策風格聯想為朝令夕改、反覆無常，因此要相信他在短短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從獨排眾議大力主張開門整風，突然變為反右的旗手，確實疑點重重。毛澤東開門整風的構想，一開始雖然遭到來自黨內高層官員極大的疑慮，然而毛仍不為所動。毛不僅一再勸說黨內同志接受他的想法，而且還親自披掛上陣，展現共產黨的誠意。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透過《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以下簡稱〈整風指示〉)，正式邀請「非黨員」參加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整風。由於洋洋數千言的文件中，只有短短39個字談到邀請「非黨員」參加，毛澤東或許擔心誠意不夠，遂選擇在文件發布的前一天(4月30日)親自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包括陳叔通、黃

<sup>30</sup> 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頁119。

<sup>31</sup>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133。

炎培等人)齊集天安門城樓，<sup>32</sup>以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的名義，舉行座談，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當天毛澤東是這麼說的：

過去是共產黨員有職有權有責，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現在應是大家有職有權有責。現在黨內外應改變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以後無論哪個地方，誰當長的就歸他管。<sup>33</sup>

甚至，毛澤東還當場批評起北京的中央機關官員來：

北京是個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中央機關的特點，一是空，二是全面。缺點就是空，一離開北京就舒服了。<sup>34</sup>

毛毫不避諱在外人面前批評起自己的黨，或許真的鼓舞了某些與會人士對他開門整風的信心，毛還說：

整風需要造成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目，分析各個方面的矛盾。……多攻一下，切實攻一下，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要找出辦法，黨內外一起來。以往開小會不靈，要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sup>35</sup>和宣傳會議<sup>36</sup>一

<sup>32</sup> 不少文獻都說這一次的座談地點在天安門城樓，例如蕭冬連、謝春濤、朱地、喬繼寧，《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上冊，頁153；或者劉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長編·第二卷(1957-1965)》，頁19，都這麼說。千家駒在其回憶錄《從追求到幻滅——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自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中，亦記得地點在天安門城樓（雖然千家駒將時間誤記為5月1日），見該書頁204。然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幫毛澤東出版的傳記，卻稱地點在頤年堂，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70。頤年堂在中南海毛澤東的住所菊香書屋內，大廳擺放著一張足夠20-30人開會的長桌，通常是毛澤東召集中共最高領導核心成員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時，才會選擇這個場地，參考吳冷西，《憶毛主席》（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1-2。像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這樣的場合，連同中共高層與與會的黨外人士，一共有44人參加，選在頤年堂開會，似乎有點說不通。

<sup>3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71。

<sup>34</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72。毛澤東對於中共黨內某些人、事的不滿，在1957年號召開門整風時，確實是存在的。類似的言論，包括1957年4月10日他對《人民日報》的批評，以及4月19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都毫不遮掩地流露出這樣的情緒。參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66-669。

<sup>35</sup> 指1957年2月27日所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這次會議因為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而成為鳴放過程中的一起關鍵事件，詳情請見下文。

樣的大會，黨內外一道開會，兩種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學作用，成了另一種東西，就靈了。各省、市都要開這樣的會，在報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沈悶的空氣。<sup>37</sup>

毛澤東話講得懇切，一再鼓勵黨外人士向共產黨「多攻一下，切實攻一下」，而且還要在報上發表，這樣的態度，顯然具有某種感染力。再加上，毛澤東最後突然告訴與會黨外人士他不準備再繼續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並希望在座者將這個消息透露出去。<sup>38</sup>毛澤東將這個涉及國家機密的消息說給在場黨外人士聽聞，必然對與會者產生某種強烈的情緒影響，間接使其講話更具說服力。

從毛澤東的這些動作，大致可以得到一個印象，即毛澤東在 1957 年 5 月以前大費周章地在黨內布置整風、苦口婆心發表「區別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sup>39</sup>同時更風塵僕僕南下天津、濟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勸服各省市領導人接受他所提出的「雙百方針」與開門整風構想，<sup>40</sup>同時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sup>41</sup>號召黨外人士不吝對共產黨提意見。毛的這些做法首先顯示了他對黨內某些幹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習氣確實不滿，其次他認為邀請黨外人士提供建言將有助於共產黨進行徹底的整風。為此毛澤東在這段時間內的許多發言極具煽動性，或者說，對於卸除黨外人士的心防極具成效。例如毛澤東在 3 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便拋出如下的話語：

<sup>36</sup> 指 1957 年 3 月 6 日至 13 日由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向與會的 160 多位黨外人士保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仍將繼續實施。

<sup>37</sup> 蕭冬連、謝春濤、朱地、喬繼寧，《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上冊，頁 153。

<sup>38</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 672-673；蕭冬連、謝春濤、朱地、喬繼寧，《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上冊，頁 154。

<sup>39</sup> 毛澤東曾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所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3 個多月後，經過多次易稿及大幅增修，正式文字稿發表在 6 月 19 日的《人民日報》上，標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關於這起事件，請見下文討論。

<sup>40</sup> 有關毛澤東這次長達 20 餘天的南下行程與講話記錄，參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 641-662。

<sup>41</sup>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 1957 年 3 月 6 日至 13 日在北京召開，相關問題亦參考下文說明。

會不會亂？會不會變成匈牙利事件？變不了的。

要是搞得一點民主也沒有，官僚主義十足，大民主不許可，小民主也沒有，甚至於小小民主都沒有，橫直是不能解決問題，那就要逼上梁上。我看在那種情況下，罷工、罷課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是調節社會生活的一種方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的方針有利於我們國家的鞏固。……不要怕批評，不要怕亂，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

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針團結幾百萬知識分子，團結幾億人民，改變現在這種面貌。那末，首先就要共產黨改變態度，改變官僚主義態度，改變教條主義態度，改變宗派主義態度。<sup>42</sup>

參加了這次會議的著名作家傅雷，在聽了毛澤東的演講後，忍不住在一封家書中寫下了他的感想：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 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抓得緊，彷彿一批評機關缺點，便會煽動群眾；報紙上越來越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這話並不錯，可是老掛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國省市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問題，二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三月十二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處；今後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也要召集黨外人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

<sup>4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40。



們舊知識分子沒有分別，加上極靈活的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sup>43</sup>

毛澤東就是希望達到這種效果，讓黨外人士相信他的誠意，相信共產黨這次真的願意開誠布公，接受大家的批評，一起來對付官僚主義、教條主義，而且不用擔心遭到秋後算賬。可是大費周章的這些布置，這些動人的演說，為什麼在黨外人士大鳴大放十幾天之後，共產黨的政策就變調了呢？毛澤東就翻臉不認人了呢？如果依照現今中共官方的反擊說，是黨外人士先進行了「猖狂的進攻」，才逼得共產黨不得不動手，那毛澤東又何必在事前把話說得那麼滿、心胸故示得如此寬大、姿態擺得如此謙虛？難道毛澤東真的沒有料到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這些民主黨派人士會講出一些讓共產黨聽了咬牙切齒的發言嗎？如果真的不想聽，為何一開始卻又放心讓這些發言都公開登在報紙上？

試看毛澤東曾經如何鼓勵黨外人士勇敢向共產黨提意見，而且向黨內同志拍胸脯保證不會出大紕漏。1957年2月27日他在有眾多民主黨派人士出席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發表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演講，毛澤東說出了這樣的語句，成功化解了黨外人士的疑慮：

(罷工、罷課、示威請願)這些鬧事，不能說主要是因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為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我說人民內部經常不斷地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事件，說匈牙利事件一來，中國的事情就不好辦了。關於這個問題，我搞了四條辦法，……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要鬧就讓他鬧；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夠；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sup>44</sup>

<sup>43</sup> 傅敏編，《傅雷家書》(香港：三聯書店，2006)，頁153。

<sup>44</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27。有關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文字紀錄事實上不只一種，日後由《人民日報》在同年6月19日所刊出的版本，則是經過大刀濶斧刪修之後的結果，與原始講話內容出入甚鉅。此處所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摘引的內容，或係來自中共中央所藏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跟上面提到他在半個月後(3月12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樣，顯然都讓許多黨外人士興奮莫名、奔相走告，結果也紛紛像傅雷一樣，落入「引蛇出洞」的陷阱，成為反右運動的受害者。毛澤東不是信誓旦旦，中國不怕出匈牙利事件，罷工、罷課的事去年有，今年也有，不能全怪匈牙利事件嗎？那麼為何黨外人士大膽講了幾句真心話之後，又開始忙不迭秋後算賬了呢？是毛澤東失算？太大意了？還是另有隱情？

再來看毛澤東如何化解黨內幹部疑慮，向他們保證大鳴大放決不會危及共產黨的江山。他在3月17日來到天津，向該市黨員幹部宣傳他的雙百方針、開門整風構想：

現在黨內有一種情緒，就是繼續過去那種簡單的方法，你不聽話，就「軍法從事」。那是對付敵人的，那個辦法不行了。……有兩個方法，一個叫壓服，一個叫說服。是採取壓服的方法，還是採取說服的方法？現在我們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壓一下的想法。壓是壓不服人的，只會使我們處於不利的地位。……至於各種錯誤的意見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開座談會評論，會不會把我們的天下搞亂，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說完全不會。<sup>45</sup>

天津講話之後，毛澤東繼續南下濟南、南京、上海、杭州，講話基調不脫他在天津的內容，目的無非要各地幹部大膽放手讓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暢所欲言，簡言之，就是一個「放」的策略。<sup>46</sup>從1957年2月最高國務會議、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再到南下各省市向地方幹部耳提面命，毛澤東

---

的檔案資料。然而1968年在武漢出版的一本《毛澤東思想萬歲》，所收錄的講話內容又與《毛澤東傳(1949-1976)》有所出入，參考鋼二師武漢大學總部、中南民院革委會宣傳部、武漢師院革委會宣傳部合編，《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10-1957.12)》(武漢：編者，1968)，頁147-166。這本1968年在武漢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實際編者為當時武漢大學哲學系教師王晁星。相關討論，請參考<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gnong/bbs/list.php?f=5>。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相關資訊，謹此致謝。

<sup>4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43。

<sup>46</sup> 有關毛澤東1957年3、4月間從天津到杭州的講話內容摘錄，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42-662。

花費了許多精力與時間，目的都於打開整個黨國機器對新聞宣傳管道的封鎖，給大鳴大放一個宣洩的空間。這麼費力地以將近半年時間進行前置作業，最難以置信的就是從「放」到「收」，大逆轉竟然只發生在短短數日之間。如果事先已經下了那麼大決心，要讓黨外人士「放」個夠，不怕天下大亂，不怕中國會出匈牙利事件，那麼「收」的決策又為何那麼匆促而決絕？這是「反擊說」最讓人百思不解的地方。毛澤東幾乎可以說是以一己之力來推動全黨接受其開門整風的構想，稱得上全力以赴，他並且信心滿滿的說在報紙、刊物上發言批評，或開座談會，不會把「我們的天下」搞亂、不會把人民政府搞倒，結果卻在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才進行一個星期，章伯鈞提出了「政治設計院」<sup>47</sup>而羅隆基脫口而出「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之後，毛便怒髮衝冠於5月15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sup>48</sup>而且重新大費周章地布置、動員另一場關門打狗運動，這其中的奧妙、轉折，確實過於啓人疑竇、不近情理。毛澤東是那種會把說話當兒戲、摸不清楚狀況、猜不準對手會如何出牌的人嗎？果真這樣，就太不符合實際的歷史經驗了。像李慎之或章伯鈞這類深刻認識毛澤東行事風格的人，就斷然不肯相信毛會如此輕忽草率、像隻沒頭蒼蠅似的；而遭毛澤東點名「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當時上海《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在他回憶反右的文章裡也認為：「運動完全是『有領導、有計劃』進行的，而且早就作了精心的安排。」<sup>49</sup>

簡言之，筆者認為中共官方長久以來堅持反右鬥爭不是共產黨主動挑起的，而是右派先猖狂進攻的說法，有其相當難於接受的疑點。有機會接觸諸多內部文件與關鍵資料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近來編輯出版了不少關於毛

<sup>47</sup> 有關章伯鈞在統戰部座談會上提出「政治設計院」的構想，儲安平批評共產黨執政是「黨天下」，以及羅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員會」，可約略參考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54-65、302、303關於這3個人的敘述。

<sup>48</sup> 上文提過李維漢在其回憶錄《回憶與研究》中，已經坦承毛澤東在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時，便下定了反右的決心。也就是說，這篇文章事實上代表著「反右鬥爭」正式登場。文章收在《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23-429。

<sup>49</sup>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411。

澤東的歷史文獻，包括 2003 年才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披露了不少摘引自原始記錄的毛澤東講話內容與手稿，乍看之下似乎證明並強化了傳統的「反擊說」。<sup>50</sup>然而正如本文上述所引證的例子，新的事證表面上或許強化了毛澤東在 1957 年 2 至 4 月間關於「開門整風」的誠意，卻依然無法解釋從 4 月 30 日至 5 月 15 日之間短短的半個月內，毛澤東戲劇性轉變的心理狀態究竟如何。「反擊說」從有利於中共當局的角度出發，儘管也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合乎邏輯性，可是卻一直禁不起深究，反而讓毛澤東在 1957 年上半年間的行事作風顯得反覆無常。而對熟悉毛澤東的意志力、決斷力及操控能力的人來說，毛絕非朝令夕改、舉棋反覆之徒。這是何以諸多反右的受害者，像李慎之、徐鑄成，或許還包括章伯鈞、羅隆基，甚至千千萬萬至今仍想不透何以會上鉤落網的右派分子，數十年來心中始終存在一個難解的謎——毛澤東號召開門整風，難道一開始就是「陽謀」（或者陰謀）？就是存心「引蛇出洞」？就是為了對中國 500 萬知識分子進行一次人格與政治上的精神閹割？然而這麼做用意又何在？500 萬知識分子能夠對共產黨鐵打的江山起什麼威脅？毛澤東不是說過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分子的毛如今只能附在無產階級的皮上，「無產階級給他們錢，讓他們教書、辦報、做文藝工作，這是贖買他們」，<sup>51</sup>既然知識分子已經被「贖買」了，毛還擔心什麼呢？

<sup>50</sup> 《毛澤東傳(1949-1976)》儘管表面上看似「系統性的」披露了一些首次公開的原始檔案材料，但事實上也可能對其中的部份內容進行了掩飾刪修的工作。舉一個例子，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將《人民日報》社長鄧拓及多位編委成員叫進中南海菊香書屋痛罵一頓，羞辱鄧拓是「死人辦報」，當天毛澤東談到雙百方針和知識分子問題時，揚言讓知識分子教書、辦報，等於是無產階級拿錢「贖買知識分子」。毛澤東還加了一句：「(贖買之說)對資本家可以公開這樣說，對知識分子不能公開這樣說。」見王若水，《智慧的痛苦》(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頁374。王若水是當場聆聽毛澤東訓話的見證人，其記錄自然有可信之處。《毛澤東傳(1949-1976)》在引述毛澤東這段講話時，雖然於注釋中明載為「毛澤東同人民日報社負責人等談話記錄，1957年4月10日」(意即依原始內部文件登錄)，然而卻刻意刪除了上述「贖買知識分子」的幾句話。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65-668。

<sup>51</sup> 毛澤東1957年4月10日教訓《人民日報》社長鄧拓時所講的話，見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頁374。

換句話說，就算真的認定毛澤東的「雙百方針」、「開門整風」一開始就是「引蛇出洞」的計謀，接下來仍必須解答另一個疑問：毛澤東何必挑選 1957 年對知識分子進行大整肅？知識分子在此時根本就不是中共政權立即而迫切的敵人，毛何苦大動干戈？

事實上像這樣繼續深究毛澤東從 1956 年 6 月到隔年上半年一整年內各篇主要談話、文稿，以及他對黨內政策路線的看法態度，還將陸續發現其他怪異曖昧之處，包括某些明顯故弄玄虛、欲言又止的話語，以及他與黨內領導層其他實力派人物之間不無可議的互動關係等等。而長久以來最啓人疑竇的，無非中共八大是否埋下了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矛盾。筆者將嘗試於下文繼續加以說明：打從 1956 年 6 月在劉少奇、周恩來主導下中共財經部門進行「反冒進」開始，到 1958 年 4 月漢口會議毛澤東提出要以「躍進」代替「冒進」，讓那些「穩妥派」不好反對為止，這將近兩年的時間，恐怕是 1950 年代的中共歷史最隱晦、最難以釐清的一段。而由反冒進轉變成大躍進，其中的關鍵極有可能就在於 1957 年的反右鬥爭。

底下，不妨從 1957 年 1 月開門整風正式上路前夕，毛澤東一些最晦澀難解的談話說起。

## 二、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一月會議」)講話

一如前文所述，毛澤東自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的講話以來，期間經歷了 3 月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南下天津、濟南、南京、上海、杭州五大城市與各省市領導人的碰面談話，最後是 4 月 30 日在天安門城樓上邀請各民主黨派人士積極參加開門整風的信心喊話，毛澤東的目的完全在於卸除黨外人士心防，鼓舞眾人放心批評共產黨的執政缺失。儘管其中的兩篇講話日後在公開發表時遭到大幅增修，以至於不少當初聽過原始講話或錄音的黨外人士大呼受騙上當，<sup>52</sup>然而

<sup>52</sup> 這兩篇日後遭到大幅修改才對外公布的文章，一是「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在 1957 年 6 月 19 日《人民日報》上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發表，加入了許多原

兩篇講話修改完畢公開發表時，反右鬥爭畢竟都已正式展開，甚至已事過境遷多年，堅持「反擊說」的中共當局仍可以站得住腳辯稱這並非引蛇出洞的伎倆。例如上文提到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便將毛澤東對「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的多次修改過程，一五一十披露在書中，試圖呈現毛澤東在5月15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之前與之後，態度確實出現了180度的急轉彎，因此並非毛澤東預謀陷害知識分子，而是後者的「猖狂進攻」，才讓毛澤東戲劇性改變了心意。<sup>53</sup>

然而至死仍堅信毛澤東確實耍弄了「引蛇出洞」伎倆的李慎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sup>54</sup>他認為毛澤東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3月12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以及4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的講話，都是全力在做「引」的工作，毛的真正意圖(藉開門整風以引蛇出洞)其實透露於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的講話中。李慎之這麼認為：

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決策，應該是在(1956年)十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後開始考慮的，而一旦形成，他就親自執行，全力以赴地做「引」的工作。……

我的體會和判斷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起意於八屆二中全會而決策於省市委書記會議，前後過了一個年頭，跨度近兩個月。這也符合毛主席歷來作重大決策的習慣，所謂「草鞋沒樣，邊打邊像」。<sup>55</sup>

弔詭的是，這場被李慎之視為極度關鍵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亦稱「一月會議」)講話，在近年由中共官方所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篇幅份量卻出奇的少，僅僅只有一頁左右的介紹，而且只摘錄了1月18日

---

始講話所沒有的警告和限制。另外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講話最後在1964年正式發表時，也作了大幅的修改。由於這個問題對於本文主旨來說並非十分關鍵，限於篇幅，本文不作贅述。

<sup>53</sup> 毛澤東從4月24日開始修改〈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直到6月9日完成，過程參考《毛澤東傳(1949-1976)》一書，頁676-702。

<sup>54</sup>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收在《風雨蒼黃五十年》，頁118-148。李慎之於2003年4月22日去世，享年八十歲。

<sup>55</sup> 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頁122、133。

開幕當天講話的部份內容，對於1月27日的閉幕講話，幾乎隻字未提。<sup>56</sup>幸好完整的講話內容在1977年《毛澤東選集》第5卷出版時已對外公開，論者方有足夠憑據得以一窺毛澤東在反右前夕，真實心意之一斑。<sup>57</sup>

必須先加以聲明的是，一月會議純粹是一場中共內部的關門會議，因此不像後來的最高國務會議、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那樣，有許多黨外人士參與。因此毛澤東在開幕、閉幕的兩天講話中，似乎有意無意地透露了他「引蛇出洞」的謀算，同時亦埋下了日後發起反右鬥爭的伏筆。他在1月18日的演講中說：

對蘇共「二十大」，我們黨內絕大多數幹部是不滿意的，認為整斯大林整得太過了。……但是，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sup>58</sup>開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

<sup>56</sup> 精確地說，是40個字，僅僅列出全篇講話（至少在13,000字以上）的七個字標題。這對於相當關鍵而又引發爭議的1月27日講話來說，是相當令人不解的編寫方式。雖然編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另外作出說明，指毛澤東1月27日講話後來成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的重要內容，然而兩者內容畢竟相差甚遠，尤其〈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還牽涉到極其複雜的修改和版本問題，因此《毛澤東傳(1949-1976)》一書有關「一月會議」講話的處理方式，顯然極易引人非議。關於這部分的內容，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15-616。

<sup>57</sup> 註44中提到的1968年於武漢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中，亦曾收錄有毛澤東「一月會議」講話的部份內容，篇幅比後來《毛澤東選集》第5卷所公布的要少，文字內容亦有相當出入，很可能是演講當時的另一份文字紀錄。因此嚴格來說，毛的「一月會議」講話並非等到《毛澤東選集》第5卷才首次發表。只不過，1968年武漢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發行範圍有限，2005年被重新發現後，近年來才在網路上流傳，在此之前，絕大多數世人知道有關毛澤東「一月會議」的內容，還是透過《毛澤東選集》第5卷的出版。

<sup>58</sup> 波茲南(Poznan)，波蘭中西部波茲南省的省會，1956年6月波蘭工人在此舉行暴動，抗議波蘭共黨政權的極權統治，遭到強力鎮壓。事件過後，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在該年10月選出改革派領袖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為黨的第一書記，波、蘇關係一度緊張。然而在哥穆爾卡的妥協下，波蘭又逐漸恢復與蘇聯的關係。有關1950年代至1960年代波蘭與蘇聯關係，參考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八卷(1949-195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頁302-306；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九卷(1960-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頁99-100。

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

我們的農村政策是正確的，我們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確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鬧不起來。……大民主也沒有什麼可怕。在這個問題上，我跟你們不同，你們有些同志好像很怕。我說來一個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講什麼，做什麼。那些壞人在搞所謂大民主的時候，一定要做出錯誤的行動，講出錯誤的話，暴露和孤立他們自己。……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幾個學生娃娃一衝，黨政軍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們這些人完全是飯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亂子，那個膿包就好解決了，這是好事。……

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於對它進行鑒別和鬥爭。田裡長著兩種東西，一種叫糧食，一種叫雜草。雜草年年要鋤，一年要鋤幾次。……雜草有個好處，翻過來就是肥料。……你草長，我就鋤。這個對立面是不斷出現的。雜草一萬年還會有，所以我們也要準備鬥爭一萬年。<sup>59</sup>

毛澤東的這場演講，距離 2 月 27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才不過 1 個月又幾天，然而用詞和口吻，完全如天壤之別。在一月會議講話中極具攻擊性的字眼，例如「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雜草有個好處，翻過來

<sup>59</sup>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 5 卷，頁 334、337-339。這篇講話在 1999 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重新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 7 卷中，並未收入。



就是肥料」；「雜草一萬年還會有，所以我們也要準備鬥爭一萬年」等等，完全不出現在一個多月後的最高國務會議講話中。雖然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也提到了有人想在中國搞大民主，不過毛並未搬出「螞蟻出洞，烏龜王八都出來」這字句，反而更近似於柔性勸說的方式，讓聽者產生共產黨或許不會硬性鎮壓的錯覺。甚至，毛澤東還刻意說出了：「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因為這些人有言論自由，有集會自由，有結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這些是憲法上寫了的，這是民主的問題」這樣的話。<sup>60</sup>

此外，決非巧合的是，前文提過鄧小平在 1957 年 9 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出現過以下的內容：「『毒草』必須鋤掉。對於『毒草』的開放，是爲了從反面教育群眾，爲了鋤掉可以作肥料」。很顯然，鄧小平借用了毛澤東在一月會議上的用語。如此一來很難不讓人產生聯想，一月會議與 6 月 8 日之後展開的反右鬥爭，其間究竟有何關連性？

而更令人高深莫測的談話，還在後頭。1 月 27 日一月會議閉幕，毛澤東發表了一篇 1 萬多字的講詞，在演講中，毛一會兒大談辯證法，一會兒說「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一會兒又說「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所有這些關於辯證法的闡釋，都是當他談到「雙百方針」與社會上的鬧事問題時的借題發揮：

關於辯證法，列寧說過：「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於對立統一的學說。……」列寧還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

我們堅持對立統一的觀點，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放香花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毒草放出來。這並不可怕，在一定條件下還有

<sup>6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22。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1957年6月19日刊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時，毛澤東講過的這些話已被重新修改安排，放入到一個強調敵我矛盾與人民民主專政的脈絡中。

益。有些現象在一個時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來以後就有辦法了。比如，過去把劇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這樣演那樣。現在一放，什麼《烏盆記》、《天雷報》，什麼牛鬼蛇神都跑到戲台上來了。這種現象怎麼樣？我看跑一跑好。許多人沒有看過牛鬼蛇神的戲，等看到這些醜惡的形象，才曉得不應當搬上舞台的東西也搬上來了。然後，對那些戲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像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志還不清楚。壞事裡頭包含著好的因素。……同樣，好事裡頭也包含著壞的因素。……

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陽的光射來叫光波，無線電台發出的叫電波，聲音的傳播叫聲波。水有水波，熱有熱浪。在一定意義上講，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戲也是起波的……寫字也起波……。這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sup>61</sup>

毛澤東這麼一連串玄之又玄的話語，究竟說的是什麼？不知道當年在場

<sup>61</sup>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45-346、348-349、355-356、361。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近年所重新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中，這篇1月27日講話有關「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等等內容，均被刪除，顯見今日中共官方，還是很忌諱這份講話中極具暗示性的這些話語，會危害到「反擊說」的合理性。

聆聽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是否領悟得出來？毛澤東提到「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還說正是從「互相排斥的對立鬥爭」的觀點出發，才提出雙百方針來，毛澤東的這些話意有所指嗎？暗示4個月後將「後發」以回擊「毒草」的猖狂進攻？當時他已經預料到「毒草」一定猖狂進攻嗎？毛澤東從列寧談辯證法扯到水波、聲波、電波、熱浪，究竟是故布疑陣、談笑用兵，還是子虛烏有、無的放矢？這些問題，除了毛澤東本人，恐怕都不會有答案。不過可以確信的一件事是，毛澤東這篇面對自己人講的話，比起此後3個月講給黨外人士聽的話，口吻、內容完全不同，甚至隱隱帶有殺伐之氣，像是「香花毒草」、「牛鬼蛇神」這類日後整人的用語，在這篇講話中已紛紛出籠。毛同時還提醒與會的所有省市級黨委書記，要準備好後發制人，讓多行不義者「自斃」。難怪毛澤東日後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可以如此大言不慚地宣稱：

大量的反動的烏烟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為什麼沒有早講？我們不是早已講了一切毒草必須鋤掉嗎？<sup>62</sup>

振振有詞宣稱毛澤東並未存心「引蛇出洞」，聲稱反右鬥爭不是「陰(陽)謀」的官方史家，如何來解釋看待毛澤東在1957年一月會議上所作的這兩次演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編輯出版《毛澤東傳(1949-1976)》時，明顯淡化處理了毛澤東的這兩篇演講稿，或許是不希望因此動搖了「反擊說」的基礎。

事實上，在1957年5月8日開門整風正式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座談會高調展開之前，黨外人士對毛澤東從1956年4月之後便大力鼓吹的「雙百方針」不是沒有戒心。費孝通1957年3月公開發表的一篇著名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便提出了知識界對共產黨會否秋後算賬的忐忑不安，費孝通說：

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

<sup>62</sup>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28。

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說不定會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很多人對自己缺乏信心，不必等別人批評，自己常常會問自己是不是舊思想又在冒頭，所以對世界大事或是國家大事自己沒個看法和主張，等等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才動腦筋。<sup>63</sup>

費孝通講得還算客氣了，有人根本懷疑這是共產黨準備「放長線釣大魚」，擺明了就是個圈套。<sup>64</sup>然而事後證明，開門整風果真就是個圈套，不是嗎？放手在5月至6月初的那短短1個月時間內讓知識分子大鳴大放，等到6月8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sup>65</sup>以及同一天《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正式吹起了反右鬥爭的號角，此時不論是雙百方針、開門整風、大鳴大放，再動人的口號聽來只剩反諷的餘悸。更何況，毛澤東5月15日就已發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訊號彈，從5月8日開始的統戰部座談會此時才不過舉辦了1星期，毛澤東真有誠意傾聽知識分子的諍言嗎？那為何只1個星期便翻臉不認人？從各種實際發生的情況來看，一月會議上毛澤東那些寓意深遠、語重心長的警語，像是「對立鬥爭的絕對性」、「香花與毒草」、「牛鬼蛇神」、「後發制人」等等，不才是他最真心的用意嗎？如果要論斷毛澤東號召開門整風究竟是不是「引蛇出洞」，卻只強調他在2月27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之後一系列充滿誠意與感性的講話，而有意無意忽略了他在一月會議上的訓話內容，絕對是偏頗的選擇。

<sup>63</sup> 費孝通，〈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

<sup>64</sup> 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在1957年4月4日杭州會議上對毛澤東的報告。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54。

<sup>65</sup> 這份中共中央指示全文，收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第10冊，頁284-286。

### 三、毛澤東動機何在？

反右鬥爭的發動，最難解的疑點可能就是毛澤東動機何在的問題。當然，如果依照官方的「反擊說」，就沒有動機不動機的問題了，不論共產黨或毛澤東，只不過是為因應右派的猖狂進攻才起而反擊，被動的行為谈不上有所謂動機。問題是「反擊說」如上所述，長期以來令人難以信服，待下文分析過中共八大的若干問題後，「反擊說」還將會暴露出其他的疑點。如果摒棄「反擊說」，將反右鬥爭從頭到尾視為一場「陰謀」，也就是毛澤東確實布置了「引蛇出洞」、「放長線釣大魚」的陷阱，那麼毛澤東的動機究竟何在？

一種想當然爾，無需多作分析的論證方式，就是指控共產黨蓄意整肅知識分子，其出發點一如「土改」或「鎮反」，動機是不證自明的。無以名之，姑且稱之為「陰謀論」，這種解釋方式尤其在長期以來的反共政治氛圍中，最為常見。<sup>66</sup>此一看法的最大問題無疑是失之過簡，事實上等於沒有真正解決問題。195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需要主動出擊，對500萬知識分子進行忠誠甄別嗎？

1956年隨著所謂「三大改造」（私營工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完成，中共內部最迫切的後續任務是如何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這也是毛澤東從1955年下半年起便大力鼓吹「社會主義高潮」已經到來，並親自編輯出版《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基本背景。<sup>67</sup>然而在毛澤東的大力鼓吹下，經濟建設速度突然急遽升溫，許多地方和部門投入了過多的基礎建設項目，造成資金和原料的短缺。當時雖然還未發生日後引起浩劫的

<sup>66</sup> 例如反右運動開始不久，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所編印的一本資料選輯《「鳴」「放」集——大陸知識分子反共言論》（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1957），編者便直接下了這樣的標題：「『大鳴大放』是『誘敵聚殲』的陷阱」，其證據亦不過就是毛澤東所寫的那篇〈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見該書頁151。其次，前文提過的丁抒研究反右運動的代表作《陽謀——「反右」前後》一書，基本上亦屬此類。另外，某些不願接受官方「反擊說」的反右運動受害者，例如前文提過的李慎之與徐鑄成，雖然認定反右一開始就是「引蛇出洞」、就是「陰謀」，然而似乎也沒有對毛澤東的動機問題，提出任何解釋。

<sup>67</sup> 有關1955年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完成的經過，參考李福鐘，〈新民主主義時期（1949-1956）中國共產黨的私營工商業政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頁206-232。

「大躍進」，然而經濟建設的供需失衡狀況已足以引起計畫部門的警覺，行政機關總主管周恩來和黨務工作負責人劉少奇很快聯合起來，要求各地方部門「反對急躁冒進」（簡稱「反冒進」）。1956年6月，周恩來和劉少奇分別在國務院和中共中央所召開的會議上，指示要壓縮基本建設投資並緊縮開支，同時各部門還要削減原定的各項經濟計劃指標。<sup>68</sup>經過了1956年上半年的「高潮」和「反冒進」，隨之中共在9月召開第八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按照大會決議，中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便在於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sup>69</sup>按照這個精神，中國共產黨接下來的工作應該放在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而非繼續進行階級鬥爭。

然而實際情形是八大閉幕不到兩個月，1956年11月10日中共召開八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宣布隔年要來一次整風，<sup>70</sup>就因為這次的整風，毛澤東將之和1956年4月針對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所提出的口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進行結合，創造出一個「開門整風」的新構想。按照李慎之的講法，整風到頭來根本沒有整，反右倒是玩真的。<sup>71</sup>令人費解的是，八大才剛結束，毛澤東不依決議專心投入發展生產力，卻大張旗鼓去弄整風幹什麼？整風後來變成整肅知識分子，毛澤東在八大結束不到50天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突然拋出整風話題，難道這時已經決定要拿知識分子開刀了嗎？既然「反擊說」有根本難解的疑點，那麼「陰謀論」又何以解釋毛澤東在八大才剛結束不久，便汲汲於對知識分子動刀呢？八大決議明明指出國內階級鬥爭已經基本上解決，為什麼毛澤東仍企圖以整風之名搞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更何況，

<sup>68</sup> 有關「反冒進」的經過，參考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上卷，頁521-541。

<sup>69</sup>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見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809-810。

<sup>70</sup>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13-329。

<sup>71</sup> 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頁133。

這還是一場針對知識界、民主黨派人士的階級鬥爭？究竟是毛無視於八大決議？還是他真的不放心知識分子，想藉此證明如果不將知識分子「都打倒」，「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sup>72</sup>那麼知識分子必然會群起造反，就像不久前布達佩斯才發生過的匈牙利事件？<sup>73</sup>

是的，毛澤東之所以決定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宣布來一次黨內整風，表面上的理由就是 1956 年夏、秋發生的波蘭和匈牙利暴動事件。只不過一開始說是整黨，後來卻變成反右，難道毛澤東擔心中國知識分子也鬧出一場匈牙利事件，於是先下手為強，以整風為誘餌吸引知識分子出洞嗎？只不過這個揣測，似乎太高估知識分子或黨外人士在當時中國的影響力了，不僅當時各民主黨派人士不相信自己有那麼大能耐，連毛澤東也不相信。上引毛澤東 1957 年 1 月 18 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一月會議」）上的講話，毛在提到石家莊一所學校學生鬧事，喊出「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等口號時就說：

那好呀！你來號召戰爭，統共那麼幾個人，你的兵就不夠，軍官也沒有訓練好。這些娃娃們發瘋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幾個學生娃娃一衝，黨政軍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們這些人完全是飯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sup>74</sup>

此後毛澤東直到 4 月底以前的幾次重要講話，不管是邀請黨外人士鳴放的最高國務會議、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或是南下天津、濟南、南京、上海、

<sup>72</sup>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卷，頁17。

<sup>73</sup> 1956年10月下旬，不滿共黨統治的匈牙利人民在布達佩斯舉行示威遊行，隨後演變成暴動，原匈共領導人納吉(Imre Nagy)被推舉出來組織政府以取代原有的匈共政權。納吉於10月29日宣布取消一黨制，建立多黨制政府，11月1日納吉甚至宣布匈牙利退出華沙公約組織，並向聯合國求援協助維護匈牙利的中立地位。11月4日蘇聯軍隊開入布達佩斯鎮壓，納吉逃入南斯拉夫大使館藏匿，不久被送往羅馬尼亞。1958年納吉被遣送回國審判，6月16日被以絞刑處死。有關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簡要經過，參考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八卷(1949-1959)》，頁307-311。

<sup>74</sup>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37-338。

杭州對各地領導官員的講話，基調都不脫這個意思，也就是匈牙利事件不會在中國發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會把共產黨的天下搞垮。毛澤東當然不是信口開河，掌握全國黨政軍最高領導權的他，必然理解前幾年才在土改與鎮反中大獲全勝的共產黨，在此時的中國早已沒有任何社會力量足以挑戰其統治權威。從這一點來判斷，毛澤東實在不至於如此戲劇性地在統戰部召開幾場大鳴大放座談會後，便勃然變色，驚覺「事情正在起變化」，急得必須趕忙動員全黨之力「反擊」。

總之，不論是官方的「反擊說」，或是毛澤東擔心匈牙利事件重演以至於設下引蛇出洞圈套的「陰謀論」，都有說不通之處，都很難察明關於毛澤東發動反右的完整確切動機。

那麼，毛澤東到底基於什麼出發點，非得在 1957 年夏天發動一場反右鬥爭不可？而且，還大費周章地從至少 1957 年 1 月起(甚至可能更早)便開始籌畫醞釀這場政治風暴？引用他後來所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對民盟與農工民主黨的批語：「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sup>75</sup>所謂「策畫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究竟真的是章伯鈞、羅隆基這些手無寸鐵的黨外知識分子搞鬼？還是毛澤東自己在整個「整風／反右」的過程中，另有見不得人的動機，無法攤開在陽光下？說不定，真正符合這一段話所形容的，是毛澤東自己才對。

#### 四、中共八大的矛盾面

本文企圖提出一個大膽的解釋：毛澤東設計「引蛇出洞」的動機，不來自於對知識分子掀起匈牙利事件的恐懼，而是對黨內主流路線政策的不滿，但又無從改變八大既有決議，<sup>76</sup>因此非得製造一起重大政治風暴，以達成扭

<sup>75</sup>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5。

<sup>76</sup> 毛澤東對八大決議所說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句話表示不滿，是1956年9月27日八大會議宣讀決議文時便已發生，因為毛澤東始終相信階級鬥爭才是主要的矛盾。參考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138。



轉當前政治氛圍的目標不可。按照這個解釋，反右運動的動機其實一如日後的文化大革命，成為中共黨內路線鬥爭的精心設計布局。這樣的說法，無疑將引導出一個極為殘酷而尷尬的結論：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原來竟是毛澤東為奪取黨內決策制高點與理論路線主導權所付出的代價。

這一個解釋要想站得住腳，至少得先弄清楚中共八大的真實面貌。自 Roderick MacFarquhar 在 1974 年出版其探討文革起源的名著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以來，美國學界對於中共高層政治史的研究，基本上即認定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過節，至少必須追溯到中共八大。<sup>77</sup>而中共自 1981 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後，將八大定性為「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sup>78</sup>主要原因，應該在於八大決議中關於當前國內主要矛盾已不是階級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論斷，這與中共 1978 年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相吻合。推崇八大路線，有助於鄧小平採取對外開放而且較自由的經濟發展措施。在這樣的背景下，1980 年代以降，有關八大代表著「全黨大團結」的形象，開始高調地被突顯。然而，八大真的是一場沒有路線分歧、無關權力衝突的黨代表大會嗎？

不要忘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有關劉少奇「罪狀」的描述，集中的焦點之一就是八大的政治報告貶抑了毛澤東的地位，尤其政治報告中的一段，談到為何從 1935 年遵義會議之後，黨中央未曾再犯過路線錯誤，劉少奇是這樣解釋的：

這個歷史的變化究竟應當怎樣解釋呢？很明顯，這不能僅僅用黨的歷史長短、經驗多少去解釋，……也不能僅僅用某個時期黨的領導者個人情況如何去解釋……。從我們黨的歷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黨的

<sup>77</sup> Roderick MacFarquhar 在書中其實從 1955 年 7 月毛澤東批評鄧子恢是「小腳女人」一事談起，不過重點隨即轉到中共八大上。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Part One 與 Part Two。

<sup>78</sup>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頁 308。

經驗多少和黨的領導人選對於黨是否犯錯誤有重要的關係，但是關係更重要的，是各個時期廣大黨員首先是黨的高級幹部是否善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總結鬥爭中的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sup>79</sup>

劉少奇這段話裡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不指名地調降了某個「領導者個人」的重要性，而強調是因為「廣大黨員」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善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總結經驗，才導致了共產黨日後的成功。劉少奇這幾句輕描淡寫的話語，在文革時遭到嚴厲地批鬥。<sup>80</sup>

近年來中共官方爲了淡化八大的矛盾面，全力維護其團結與和諧的形象，試圖藉由出版某些與八大相關的文件檔案、口述歷史和史論，以反駁長期以來外界關於八大造成毛、劉不合的論斷。<sup>81</sup>不過即使是這樣「有選擇性地」、目的導向式地公布了許多官方檔案室內的原始文件，仍不能完全化解某些早已被學界拿放大鏡挑出來的疑點。例如 MacFarquhar 在其書中引述了

<sup>79</sup>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見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頁64。

<sup>80</sup> 例如一份署名「中共中央黨校 王中、郭丕衡」，於1966年11月7日發布的大字報，便以「徹底清算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為標題，將劉少奇八大政治報告中的這一段話摘引出來，以證明劉少奇「把自己擺在毛主席同等地位，分庭抗禮」，「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天才和英明偉大」。見方君歸主編，《劉少奇問題資料專輯》（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頁371。Roderick MacFarquhar在*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一書中亦引用文革期間的出版品，說明劉少奇的這段話並未逃過毛澤東的法眼，以至於在文革中備受攻擊。見該書，頁103、350。

<sup>81</sup> 例如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楊勝群、陳晉主編，《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紀實》（北京：三聯書店，2006）；〈鄧力群談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八大前後〉，收在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等皆是。1994年毛澤東生前的保健醫生李志綏以中、英文發表其回憶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中共官方為加以反擊，特別找來毛生前的秘書林克、保健醫師徐濟和護士長吳旭君合寫了一本口述歷史《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詞》（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林克在書中專門針對李志綏有關八大的描寫提出反駁，見該書頁40-54。2003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更是毫不含糊地針對八大文件起草過程，將毛澤東與其他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書信往返情況，作了詳細的交待，見該書上冊，頁507-544，企圖藉此說明八大文件（尤其是政治報告）的整個起草經過，毛澤東是全程參與的。

一段劉少奇妻子王光美在文革期間被迫坦白時，針對劉少奇的責任問題作出辯解，王光美說不論是八大政治報告或是大會決議，都是在非常匆促的狀況下定稿的云云。<sup>82</sup>而依照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共八大史》或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所連篇累牘展示出來的八大政治報告的修改過程來看，從醞釀到完成費時長達1年又4個月，前後的各種修改稿達到80多份，然而一直到開會前兩天，也就是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還寫信給周恩來，要他針對報告第一部份關於「一五」(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經驗總結內容改得再流暢一點。<sup>83</sup>甚至直到開會前幾個小時——1956年9月14日晚上11點，最後的修訂部份才送印。<sup>84</sup>大會決議也是一樣的問題，而且更加忙亂，一直到9月27日下午1點多，毛澤東才接到最後的修訂稿，而這時距離閉幕式開始，只剩1個小時。<sup>85</sup>日後毛澤東對八大決議文中的某些內容極度不滿，並在反右已如火如荼展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公開指責八大決議內容是「不對的」，<sup>86</sup>事實上與相關重要文件最後的修訂過程竟然如此倉促，脫離不了關係。

曾經擔任毛澤東保健醫師超過20年的李志綏，在他的回憶錄中揭露，毛澤東曾在文革中多次向他提過，劉少奇的八大政治報告事先並未送交毛過目，而且即將在八大之後出任總書記的鄧小平，甚至要毛澤東休息，不要參加會議。毛對此抱怨說：

我提出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可是我仍然是黨的主席啊。召開八大為什麼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報告起草討論，我沒有參加，事先稿子也不給我看，說是來不及了。我又沒有離開中國，有什

<sup>82</sup>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p. 101.

<sup>8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516-518。

<sup>84</sup> 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中共八大史》，頁167。

<sup>85</sup> 有關八大政治報告和大會決議的修改經過，請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509-537；以及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中共八大史》，頁150-182。

<sup>86</sup> 有關這部份的經過，另於下文詳述。

麼道理說來不及，不讓我看一看呢？<sup>87</sup>

雖然日後中共當局找來了3名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隨侍人員，以《歷史的真實》為書名展開對李志綏回憶錄的批駁，包括上引的這一段話，<sup>88</sup>然而不應忽略的一個事實是，李志綏的回憶錄是憑著記憶寫下來的，他的所有日記都已在文化大革命中燒燬了，<sup>89</sup>李志綏的記憶容或並不精確，但並不代表他說謊。就以上引的這一段話來說，李志綏很可能是把兩件事搞混了，或者說，是毛澤東談起這兩件事時，李志綏不清楚整個來龍去脈，以至於產生了不夠精確的記憶。毛澤東所說的八大政治報告沒有事先送他看，指的可能是決議最後完稿過程極為倉促，尤其是陳伯達指示胡喬木對日後引起爭議的幾個句子作了修改，<sup>90</sup>以至於毛驚訝地發現某些內容與他的想法違背。總之，日後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指控決議中的部份內容是不對的，這是事實，同時顯然毛也對八大文件最定稿得如此匆忙，心生不快。李志綏或許在文字的使用上不夠準確，然而筆者不認為毛澤東向他發牢騷這件事是捏造的。

至於鄧小平公開要毛澤東「休息」這件事，則絕非空穴來風，而且有官方紀錄為憑。只不過事情不發生在1956年中共八大開會前，而是1960年8月10日北戴河會議結束時。當時大躍進以極悲慘的結局收場，加上中蘇關係急轉直下，莫斯科召回所有派駐在中國的技術專家，這一個夏天的北戴河會議氣氛極度低迷。在會議結束當天，鄧小平公開宣布要毛澤東「脫離一下工作」，改由劉少奇主持，而且「小事就不要過問了」，「這樣比較好」。此時康生插嘴，問《毛澤東選集》第4卷的注釋是不是請主席再看一下，彭真竟直接否決：「不要他看了」，鄧小平接著說：「可以不看了，我們定了算了，那個裡面沒有什麼重大的問題。」<sup>91</sup>筆者相信，毛澤東向李志綏抱怨鄧小平要他「休息」，指的是這件事。只不過，李志綏並不理解某些細節背後的完

<sup>87</sup>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73。

<sup>88</sup> 林克、徐濟、吳旭君，《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詞》，頁41-46。

<sup>89</sup> 李志綏，「自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1-13。

<sup>9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537。

<sup>91</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90-1091。

整脈絡，因而在 1990 年代出版的回憶錄之中，亂點鴛鴦譜，將某些事情誤植了。但是，筆者寧願相信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確實對李志綏提出對八大籌備前後諸多問題的抱怨。而且，這裡頭確實有對劉少奇個人的不滿。

總之，儘管中共當局不斷想證明八大是一場團結的黨大會，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在八大期間完全沒有問題，然而事情絕非那麼簡單。由於官方出版品所公布的材料幾乎盡是檯面上的公文往來文件，而許多隱藏在背後的心理狀態，或是檯面下的細微動作，其真實含義仍然難以釐清。或者應該說，透過官方史料所呈現出來的正經八百卻略嫌刻板的毛澤東，對於「某些」近距離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員、或長期觀察他的研究者來說，是欠缺足夠說服力的。

## 五、毛澤東與黨的關係

事實上，就算光從官方所公布的資料中，仍然可以看出在鼓吹開門整風之際，毛澤東對共產黨內部的某些情況，是極度不滿的，以致於在許多不同場合，不經意流露出一種憤懣之情。毛澤東對黨機器的不滿，不會是突然產生的，不會是因為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才反省到黨內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作祟，因而必須來個整風；亦不應該是間歇性的，6月「反冒進」時心懷愠怒，八大召開時卻恨意全消，然後過了一年又承認自己過去一整年都在生氣。<sup>92</sup>相反的，毛在 1956 年 6 月「反冒進」出現之後，已經清楚流露出對黨內主管官員的不滿，而匈牙利事件正好可以作為一次震撼教育，順勢推出整風。1957 年 4 月 10 日毛澤東爲了《人民日報》沒有按照他的旨意組織大鳴大放的文

<sup>92</sup> 1957年12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會議，為接下來的南寧會議作暖身，當時毛澤東就對周恩來、胡喬木、彭真等人說：「1956年反急躁冒進，我的心情受到壓抑，整個一年心情不舒暢。」見〈鄧力群談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八大前後〉，收在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頁53。根據這話的意思，毛澤東從1956年6月到1957年上半年，整整一年是處於壓抑狀態的。這點從一個月後南寧會議召開，毛澤東所發洩出的許多怨言，可資旁證。而事實上，中共建國後毛澤東對於黨機器運作狀況的不滿，至少還可以再往前推到1953年上半年的新稅制事件，只不過限於篇幅，非本文所能涵蓋。至於從1956年6月「反冒進」到八大，毛澤東心中對劉少奇、周恩來為核心的行政部門逐漸累積的憤怒，將於下文中再作進一步說明。

章，於是把社長鄧拓及多位編輯叫他的住所，大罵一頓，罵鄧拓是「死人辦報」。在訓話中，毛澤東說了這樣的話：

我願意同民主人士、中間派談，比如李鼎銘。黨員的黨話太多。近來我在找黨外的教授、工程師談。<sup>93</sup>

幾天之後，毛澤東發出一份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區、中央一級部門和國家機關各黨組將各自所接觸到的有關「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匯報到中央來，毛澤東在這份指示中這麼說：

第一書記和中央一級黨員部長……是否自己將這個極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認真抓起來了，還是依然委託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過去那樣不大去動腦筋……<sup>94</sup>

這個月月底(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邀集各民主黨派人士聚會，呼籲大家鳴放幫助共產黨整風，毛澤東當天講了這些話：

北京是個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中央機關的特點，一定空，二是全面。缺點就是空，一離開北京就舒服了。<sup>95</sup>

這次聚會之後，民主黨派人士陳叔通和黃炎培連袂寫信給劉少奇和周恩來，希望劉、周勸毛澤東不要辭去國家主席一職，毛澤東看到信之後，5月5日作了幾點批示，其中赫然出現這麼一句：

……這個國家已經推不動了。<sup>96</sup>

5月14日，毛澤東在看過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刊載的22位中小學教師對於共產黨執政情況的批評後，將報紙轉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和彭真看，毛的批語主要就是這麼一句：

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sup>97</sup>

<sup>9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66。

<sup>94</sup> 毛澤東，〈限期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報告中央〉，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頁292。

<sup>9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72。

<sup>96</sup> 有關陳叔通與黃炎培給劉、周的信件，以及毛澤東的批語，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第6冊，頁457-460。

<sup>97</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68。

不要忘了，5月15日毛澤東隨即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反右鬥爭此後便轟轟烈烈展開了；然而在5月14日，毛澤東還認為《解放日報》所刊登的22位中、小學老師所提出的諍言「值得過細一看」！《解放日報》當天有關這22個教師座談會的報導標題是：「大膽揭露矛盾，幫助黨內整風」，<sup>98</sup>在大鳴大放期間，教育界對於建國以來學校黨委插手干預教學與辦學的情況可說是罵聲連連，這22名中、小學教師的發言想必亦屬此類，連毛澤東看了都不得不發出「不整風黨就會毀」的喟嘆。由此證明，毛澤東其實相當清楚基層的抱怨聲音，大鳴大放究竟會鳴放出什麼東西，完全在其掌握中，毛澤東也早就知道牛鬼蛇神都將出籠，毒草與香花共舞、烏龜與王八齊飛。<sup>99</sup>然而他既確信黨非整不可，也知道開門整風必會招來各式各樣的批評，仍然在5月15日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醞釀動員黨內展開反右。毛澤東到底如何算計，著實費人疑猜。

再舉一個例子，同樣可以說明毛澤東在5月15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前後，對情況的發展其實瞭若指掌，大鳴大放既未出乎他原先的料想，情勢亦未失控。這是1957年5月知識分子群起鳴放之後，風潮很快傳染到了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校園裡，學生自發性地舉辦起辯論會、張貼大字報，形成了後來被稱為「五一九運動」的學生鬧事事件。<sup>100</sup>據當時擔任毛澤東秘書的陳伯達回憶：

當時，北京大學也出現了許多大字報，新華社和北京大學黨委向中央反映，認為情況嚴重，說是北大已成了海德公園了。毛主席叫我去看一看，我就去看了。其實，學生的大字報就是給學校黨委和領導提了一些意見，沒有什麼不得了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回來以後我向毛主席談了我的看法。<sup>101</sup>

<sup>98</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68。

<sup>99</sup> 牛鬼蛇神、香花毒草、王八烏龜，都是毛澤東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講話中所使用的字眼。

<sup>100</sup> 有關「五一九運動」，參考朱地，《1957年的中國》（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頁218-222。

<sup>101</sup>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148。

日後毛澤東曾在 1959 年 2 月 2 日一場省市黨委書記會議上提起這件事：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報導北京大學問題，說是右派猖狂進攻，鬧得很厲害。陳伯達去看了，不是那麼了不起。<sup>102</sup>

既然情勢並未失控，「不是那麼了不起」，那麼何來「不得不反擊」的硬道理？如果早就料到知識分子的鳴放必然會出現如此局面，那麼日後的「反右」就不是忍無可忍，而是請君入甕的詭計了！

事實上，就在毛澤東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的第二天(5月1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一份給所有省部級以上幹部的指示，同樣可以確切顯示出毛在 5 月 15 日前後，一點沒有遭到「猖狂進攻」的急迫感，依然清楚掌握事態的發展，與他在 5 月 14 日看過《解放日報》22 位中小學教師對共產黨的批評之後的反應，基本上類似。毛在這份指示中說：

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對於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從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來，不正確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號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黨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溝、高牆，不講真話，沒有友情，隔閡得很。……黨員盛氣凌人，非黨員做小媳婦。學校我黨幹部……不向資歷高學問多的教員教授誠懇學習，反而向他們擺架子。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搬(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sup>103</sup>

很明顯的，毛澤東完全了解黨外人士大鳴大放的內容，並非無的放矢，亦非存心挑釁，這與「反擊說」所要刻意塑造的某種緊張急迫的情境，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

至此不妨再回頭對「反擊說」進行一次全面的檢視。依照這種說法，「右派猖狂進攻」，於是毛澤東驚覺「事情正在起變化」，不得不進行反擊，那麼，

<sup>102</sup>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149。

<sup>10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477。



毛澤東何以在 5 月 14 日仍感慨《解放日報》所刊載的中、小學老師的批評確實有道理，並將之轉給劉少奇等政治局常委閱讀，並加上一句批示：「不整風黨就會毀了」？又何以毛澤東在 5 月 16 日對省部級以上幹部的指示中，清楚了解黨外人士對共產黨的批評「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誠懇的，正確的」，卻又執意要發動一場對黨外人士的大規模鬥爭，並將之上綱上限成「敵我矛盾」、「階級鬥爭」？若干明確證據揭示，毛澤東其實始終都在狀況之中，共產黨員如何盛氣凌人、作威作福，知識分子如何忍氣吞聲、謹小慎微，毛澤東完全看在眼裡。他也知道一旦開門整風，知識分子遲早要站出來大鳴大放，各種對共產黨的批評必然紛至沓來。只不過，毛澤東顯然心裡有數，知識分子的批評動搖不了共產黨的江山。毛不是早保證過嗎：「不會出匈牙利事件」，「不會把我們的天下搞亂，把人民政府搞倒」，「除非我們這些人完全是飯桶」。當 5 月 14 日毛讀到上海《解放日報》的鳴放言論，一方面或許感慨地方官員和黨的幹部惡行惡狀，果然已到了非整頓不可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恐怕也開始算計著——對知識分子進行反擊的時間點，也差不多到了吧！總之，毛澤東關於開門整風的布置，從頭到尾都是極冷靜的，是按步就班的，一步步等著大魚入網，然後可以開始「收」。從 5 月 14 日毛澤東看過《解放日報》之後的短短一句批語，到隔天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再到 5 月 16 日對省部級以上幹部的指示，都可以窺見毛澤東整個從容不迫的布局。

至此本文必須提出一些初步的結論，即 1957 年上半年毛澤東大張旗鼓布置開門整風之時，確實對黨內普遍的作風狀況是不滿的，以致於迭出怨言，而且這種不滿至少必須上溯至八大以前。同一時間，毛澤東也知道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統治可能怨聲載道，只是沒有釋放管道，因此聽不到。此時匈牙利事件或許成爲一個靈感的觸媒，讓毛澤東意識到如果把這兩樣東西（「整風」和知識分子）擺放在一起，說不定會擦出特別的火花。這種情形一如 1966 年文革爆發時，毛澤東必須假借體制外力量來鬥垮黨內當權派，是一樣的道理。但是，毛澤東 1957 年之際顯然不準備讓知識分子的發言真的危及共產黨的統治基礎，他放手讓知識分子大鳴大放一陣，目的是讓黨內同志難堪、

警醒，產生危機感，然後毛澤東再把局面抓起來，便可以重新掌握黨的政策和路線的制高點，官員幹部經過教訓，才會伏伏貼貼、俯首聽命。

這是筆者對於上述「毛澤東動機何在」的提問，一個比較完整的猜測。

其實，毛澤東的這套統御術，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的結論報告中，便已作過扼要的介紹，毛澤東當天這麼說：

有這樣一個辦法：當著人們剛剛想要驕傲的時候，那個尾巴剛剛翹起來的時候，就給他提出新的任務……，使他來不及驕傲，他沒有時間。這個辦法，過去我們是試過的。在軍隊打了一個勝仗之後，有的同志剛剛同那些左右前後的人談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尾巴翹得那麼高的時候，你就給他提出打第二仗的新任務。把新的任務一提出去，他馬上就要想問題，就要做準備工作，那個翹起來的尾巴就下去了，他來不及驕傲。<sup>104</sup>

毛澤東不僅不希望黨內同志驕傲，同時還要求眾人依他的指揮棒前進，辦法其實一模一樣，就是拋出新問題，讓所有翹起來的尾巴都紛紛「下去」。「開門整風」是新任務，「反右鬥爭」也是。毛這麼做的目的主要就是一件：讓黨的路線回到他的設定來。

## 六、從「反冒進」到「反右」

本文最後仍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毛澤東對黨機器的不滿，究竟源於何時？出於何種原因？不解決這個問題，則對於從1955年下半年「社會主義高潮」至1958年「大躍進」的整個脈絡，將無法整體掌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中國共產黨為求穩定新國家的根基，因此在經濟策略上採取相對保守穩健的路線，此即所謂「新民主主義」階段，時間大致上至1956年年初為止。<sup>105</sup>1956年隨著所謂「三大改造」（私營工商業、

<sup>104</sup>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215。

<sup>105</sup> 有關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參考李福鐘，〈新民主主義時期(1949-1956)中國共產黨的私營工商業政策〉。

手工業、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完成，中國號稱邁入社會主義階段。在這幾年從新民主主義邁向社會主義的摸索過程中，毛澤東從原本主要關心政治、軍事層面決策，逐漸轉移注意力到經濟事務上來。1953年上半年發生新稅制爭議，曾一度讓毛澤東大發雷霆，並因此懲戒了中財委副主任薄一波，周恩來、陳雲都受到波及。當時毛即表示過去他對財經工作生疏，「抓得少，抓得遲」，未來他要「亡羊補牢」，多加鑽研。<sup>106</sup>

1955年6、7月間，爲了農村合作化速度究竟該快該慢，毛澤東又損上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這一次鄧子恢被毛澤東罵作「小腳女人」。爲了反駁經濟路線上力主穩健路線的務實派，毛澤東特別在這年夏天花了兩個月時間編出一套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書，以證明他的看法是對的。受到毛澤東急於跨入「社會主義高潮」強烈意志的驅策，「三大改造」在幾乎完全沒有阻力的情況下，終於在1956年頭幾個月內便大功告成。<sup>107</sup>

在1955年至1956年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過程中，無可諱言毛澤東的主觀意志始終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沒有毛澤東的鼓勵逼促，「三大改造」絕不可能以這麼快的速度完成。然而就因爲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太快，許多地方和部門投入了過多的基礎建設項目，造成資金和原料的短缺。行政機關的總主管周恩來和黨務工作實際負責人劉少奇很快聯合起來，要求各地方部門「反冒進」。1956年6月，周恩來和劉少奇分別在國務院和中共中央所召開的會議上，指示要壓縮基本建設投資並緊縮開支，同時各部門還要削減原定的各項經濟計劃指標。<sup>108</sup>

對於財經工作上的「反冒進」，毛澤東是極度不悅的，然而正如1953年他在批評薄一波時自己承認的：「對財經工作生疏」，這一次他對於財經部門大舉削減建設計劃，心有不滿卻又難以啓齒。最能表達他這種心境的，是1958

<sup>106</sup> 相關過程，參考李福鐘，〈新民主主義時期(1949-1956)中國共產黨的私營工商業政策〉，頁160-170。

<sup>107</sup> 有關1955年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完成的經過，參考李福鐘，〈新民主主義時期(1949-1956)中國共產黨的私營工商業政策〉，頁206-232。

<sup>108</sup> 有關「反冒進」經過，參考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521-541。

年1月在他發起「批判反冒進」過程中相當關鍵的南寧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寫了文章，<sup>109</sup>反了右傾，心血來潮，找了三十四個部長談話，談了十大關係，就頭腦發脹了，「冒進」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長了。三中全會，<sup>110</sup>我講去年砍掉了三條(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沒有人反對，我得彩了，又復辟了，我就有勇氣再找部長談話了。<sup>111</sup>

從「不敢接近部長」，到「有勇氣再找部長」，可以很明顯感受到毛澤東話裡的不滿與譏諷，以及他對於「反冒進」的反感。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這裡所用的「部長」二字，有向財經技術官僚示威的用意。同樣的情緒，表達在同一篇講話的不同段落中：

財經部門……總是傾盆大雨，<sup>112</sup>發生逕流，總不開恩，總沒有準備好，不完全，這就是封鎖，這是斯大林的辦法。開會前十分鐘拿出文件來讓人家通過，不考慮人家的心理狀態。<sup>113</sup>你們是專家，又是紅色，政治局多數人是紅而不專。我攻擊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長以上的幹部，也不是攻擊所有的人，是攻擊下傾盆大雨的人，封鎖的人。<sup>114</sup>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還挾怨算了一筆老賬，這是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這篇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事實上是劉少奇下令中宣部依照「反冒進」的精神所寫的，文章寫好之後劉少奇特別批示：「主席審閱後交喬木辦」。結果毛澤東看到稿子後，逕直批了：

<sup>109</sup> 應指毛澤東關於《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收入《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221-224。

<sup>110</sup> 指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被視為是毛澤東批判「反冒進」的開端，毛同時在這次會議上對中共八大的部份決議表達了強烈不滿。

<sup>111</sup> 編者不詳，《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出版者不詳，1969)，頁151。

<sup>112</sup> 所謂「傾盆大雨」，指的是財經部門送給毛澤東的報告總是材料數字一大堆，讓他難以消化。日後周恩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作自我檢討時，便曾經自責：「即使請示了，報告了，也不是『毛毛細雨』，而是『傾盆大雨』，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對於需要做出決定的問題，來不及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51。

<sup>113</sup> 毛澤東這段話所說的，或許是八大決議文在閉幕大會召開前一個小時才拿給他核示這件往事。

<sup>114</sup> 編者不詳，《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出版者不詳，1969)，頁149-150。

「不看了」三個字。<sup>115</sup>1958年1月12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舊事重提，雖然已隔了1年又7個月，毛依然怒氣未消：

反「冒進」，六億人民洩了氣。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什麼看？<sup>116</sup>

毛澤東自1956年6月起就對把持黨務與行政體系的劉少奇與周恩來不滿，而且抑鬱了一整年。這種不滿不完全是個人恩怨，主要還是政策路線。毛澤東對於劉少奇與周恩來所堅持的穩重保守策略相當不以為然。毛澤東所冀望的，是日後大躍進那種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和激情。然而儘管此時毛對官僚體系不滿，卻也無計可施，因為財經官員個個顯得又紅又專，而毛覺得自己是「紅而不專」。於是，「不敢接近部長」的怨氣就開始累積了，一直累積到1957年上半年號召開門整風，還四處放話說：「這個國家已經推不動了」、「一離開北京就舒服」云云。

怨氣一直要到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尤其是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才得以一吐為快。而這中間所經歷的，正是八大、開門整風，以及反右鬥爭三件事。可以說，從「反冒進」毛澤東自認為被打壓，到1957年9月八屆三中全會毛重新奪回理論的詮釋權和路線決定權，一年餘的時間裡，中共最高領導層經歷了一次政策的大翻盤。毛澤東是如何做到的？

這就是本文最主要的論點：反右鬥爭其實在毛澤東取得財經事務決策權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筆者有理由據此認為：毛澤東為奪取黨內財經政策的最終決策權，策動了整起反右運動。

「反冒進」與中共八大，讓毛澤東在1956年下半年深感挫折，因為對他這位共和國的締造者來說，在推翻「三座大山」<sup>117</sup>之後，竟然在社會主義

<sup>115</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534、538。

<sup>116</sup> 編者不詳，〈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出版者不詳，1969），頁152。

<sup>117</sup> 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謂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推翻的三座大山。

建設的偉大進程中使不上力，「靠邊站」，甚至有缺席之危機，這是何等的難堪！更何況，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這一群政策執行者和行政體系的實際掌權者，和他的想法竟如此南轅北轍。是可忍，孰不可忍。毛澤東的這種憤懣，開始表現成爲一些相當怪異的政治肢體語言，1956年5月至6月間，毛澤東一口氣游了珠江、湘江和長江，<sup>118</sup>此外，毛還不尋常地透露要辭去國家主席、甚至是中共中央主席的職務。<sup>119</sup>對此，李志綏的解讀是毛澤東企圖以此舉試探黨內同志——尤其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對他的忠誠度。<sup>120</sup>事後證明，毛澤東最後辭去的只是無關痛癢、而且還可省去許多繁文縟節的國家主席，中央主席一職他則一直擔任到去世爲止。

然而，最令毛澤東忐忑不安的，恐怕還是史達林死後遭赫魯雪夫鞭屍這件事。毛開始懷疑，他的身邊是否也躲著一位赫魯雪夫，準備日後否定他的歷史定位。從「反冒進」到八大的召開，毛愈來愈坐實了他的這種猜忌。<sup>121</sup>與其坐以待斃，放任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完全主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基調、路線和政策執行，最終毛澤東只淪落爲象徵性的精神領袖；還不如放手一搏，另闢戰場，由開門整風轉進爲反右，最後成功扭轉黨內的路線方向，毛澤東重新奪回理論的詮釋權。

反右鬥爭如火如荼展開之後不久，毛澤東在1957年10月9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最後一天發表演說，直接宣稱：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

<sup>118</sup> 關於1956年毛澤東游三江的經過，參考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48-155；趙志超，《毛澤東十二次南巡》（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6-22。

<sup>119</sup> 毛提出「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按：指中共中央主席），是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爲此中共八大修改黨章時，特別加了一條：「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名譽主席一人」。參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520-521。至於辭去國家主席，前文已提過他在1957年4月30日於天安城樓接見黨外人士時，公開了他想辭去國家主席的念頭。事實上，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討論修改八大政治報告草稿期間，毛已提出這個意見，見同書，下冊，頁907。

<sup>120</sup>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72。

<sup>121</sup> 限於篇幅，本文不擬對這個議題作過多的贅述，李志綏對此的觀察雖然過於簡略而且不甚周全，筆者仍建議參考，見《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72-174。

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sup>122</sup>

如果沒有反右鬥爭，光憑毛澤東一己之力，就能夠把全黨的路線主軸、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制高點，重新拉回到階級鬥爭上來嗎？毛澤東僅憑著黨主席職務的威勢，就能夠改變八大的決議內容嗎？借力使力，反右運動正是中共黨的路線從八大前的「反冒進」轉向 1958 年大躍進的轉捩點。別忘了，八大所定下來的政策基調是：「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sup>123</sup>如果按照八大的路線走下去，劉少奇和周恩來所代表的整個技術官僚群將更加牢固地掌握黨機器的控制權，而毛澤東的地位極有可能在這種以發展經濟為主軸的「既紅又專」路線中，被邊緣化。政治嗅覺極端敏銳的毛澤東，從 1956 年 6 月以來「反冒進」的情勢發展，已經聞到了這種危機。

當然，即使貴為黨主席，毛澤東也不可能毫無理由違逆八大的決議，力排眾議將黨的路線又扭轉回階級鬥爭的路線上來。既然無法正面挑戰八大的決議，那麼，從側面另闢戰場，成了毛澤東迂迴包抄戰術的思考點。波、匈事件的適時出現，給了毛澤東難能可貴的藉口，他再次耍弄出 1942 年延安整風中徹底鬥倒留蘇派的手段，以整頓「三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為藉口，逐步地將全黨的路線又拉回到階級鬥爭的道路上來。李慎之稱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不僅在殲滅國民黨百萬大軍的戰場上如此，在權謀鬥爭的政治角力場上亦如是。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毛澤東，才可能真正理解毛澤東。而不是如李維漢筆下，那位聽了手無縛雞之力的羅隆基一句謗言，便勃然大怒的庸君。

<sup>122</sup>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75。

<sup>123</sup> 八大決議內容，見，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頁809-810。

以整體歷史發展的角度，重新思考 1956 年至 1958 年北京政局，反右運動於是成了毛澤東重新奪回黨的路線決定權與理論發言權的關鍵轉折。

然而，毛澤東怎麼想到利用黨外人士的大鳴大放，與他在黨內發動整風的構想，進行如此完美的結合？兩者所催生的化學反應，簡直渾然天成，一下子就改變了八大所營造的輿論氣氛與政治生態。毛澤東是怎麼辦到的？

筆者認為，這正展現了毛澤東對於知識分子心態的敏銳感受力與掌握能力。毛澤東顯然評估過，光憑黨內「關門」整風，欠缺足夠的動力來調動黨內幹部的積極性，也沒有真正強烈的議題可以挑戰八大的路線。更何況，1955 年下半年發動的肅反工作，此時尚未完全結束，<sup>124</sup>不到兩年時間要再來一次黨內整風，談何容易。既然黨內動能不足，借助外力遂成爲必須的選擇。而且毛澤東顯然很有把握，知識分子一定會上鉤，因爲他太了解他們了，這群知識菁英們早就忍受不了共產黨這八年來套在其頸項上的緊箍咒，毛澤東只是輕輕打開一個缺口，知識分子們焉有不蜂擁而上，入我甕中的道理。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上鉤，但是，只要某些具有象徵意義的大魚上鉤就行。羅隆基是這樣，章伯鈞、儲安平也都是這樣。李慎之認爲羅隆基發出「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的牢騷後，毛澤東事實上正爲大魚入網而高興，確是有見地的判斷。在毛澤東的眼裡羅隆基只如螻蟻，他說了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夠引起共產黨集體的危機感。北大、清華校園的騷動，讓身爲黨官的清大校長蔣南翔焦急萬分（相較之下並非黨官的北大校長馬寅初表現則截然兩樣），同時大鳴大放言論在《文匯報》、《光明日報》上刊出，讓機關與各級領導幹部咬牙切齒、顏面掃地，毛澤東需要的正是這種危機感，靠著這種危機感所凝聚的黨內能量，毛澤東才能夠顛覆八大既有的權力格局。

<sup>124</sup> 1955年7月開始的「肅反運動」，導火線是該年上半年潘漢年被捕與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爆發，使毛澤東認爲建國以來仍有許多暗藏的反革命隱匿在社會上和黨內，因此要求各機關、部門必須舉發一定比例數額的暗藏反革命分子。結果在兩年的肅反運動中，全國一共清查了177萬多人的政治歷史問題，查出了十萬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有關肅反的大致情形，參考高化民，《共和國年輪·1955》（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頁322-334。



## 七、結論

本文企圖重新詮釋毛澤東發動反右鬥爭的動機，目的不僅僅只在於對中共官方史學提出挑戰，也不僅僅想證實長久以來關於反右是一場陰謀(或「陽謀」)的指控。本文最主要的目的，還是企圖對從 1956 年「反冒進」到 1958 年「大躍進」之間的歷史演變，提出一個脈絡較為一貫的解釋。中共的官方史書，一般將「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整風-反右」和「反冒進-八大-批判反冒進-大躍進」兩組事件切割開來，在這樣子的歷史解釋方式下，1956 年到 1958 年之間發生在中共內部的諸多事件，便成為極零散與完全不相干的個別事件。讀史者完全不能理解何以毛澤東在八大閉幕一年之後，才突然公開指責八大決議部份內容是「不對的」；而毛對八大決議的不滿，卻又如此戲劇性的在反右之後隨即爆發出來？「反冒進」明明讓毛澤東極不舒服，那麼八大又何以能夠開得那麼團結和諧？八大既然在 1956 年 9 月開過了大會，為什麼 1958 年 5 月又召開了「第二次會議」？這在中共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事情。更何況，劉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上還對「反冒進」作了檢討，等於俯首認可毛澤東的「冒進」路線才是正確的。只不過，此時「冒進」已改名為「躍進」，毛澤東還得意揚揚宣稱要將「第一號博士」學位頒給發明這個口號的科學家。<sup>125</sup>所有這些疑問，如果沒有把「整風-反右」這一組事件放進來作一併的思考，便不可能得到真正合理、前後一貫的解釋。而且，有關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和之後發生的波蘭、匈牙利事件對於中共內部政治生態的影響，也只有將之與「反冒進-八大-整風-反右」等等事件整個放置在一起思考觀察，才能夠得到更充分而深入的理解。

當然，就實證的基本要求來說，試圖證明以上這個推論，還需要更直接的文獻依據，然而這正是研究反右運動最困難的一點。這裡頭還分為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無法確知掌握著官方檔案的中共黨史機構，所願意公開的文

<sup>12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7冊，頁254。

件究竟經過了怎樣的刪修過程；二是毛澤東是否曾經將他的真實意圖表現為文字？如果毛澤東始終將最關鍵的私密隱藏在心底(這個可能性其實還蠻高的)，那麼研究者所能據以研判真相的文獻，便只能是經過偽裝的文字陷阱而已。

無論如何，本文還是嘗試在修裁剪接得幾乎密不透風的官方檔案中，試圖挑出「反擊說」在邏輯上的若干疑點，包括毛澤東「變臉」的速度委實太過驚人，以及「變臉」前後毛的思路始終清晰一致，絲毫不曾流露出猶疑慌亂的痕跡。毛澤東的鎮定若常，反而更顯得「反擊說」站不住腳，而預謀的可能性或許還高些。如果真的沒有事先套招，那麼毛澤東起碼也該流露出一些正常人應有的反應才對。然而沒有，至少官方文件所顯示的，毛澤東從頭到尾都是一付胸有成竹的模樣。這難道還不足以構成預謀的證明嗎？至少，是非常啓人疑竇的。

當然，本文也不接受太過簡單的「陰謀論」。在這種被簡化的刻板印象裡，毛澤東成爲一個殘民以逞的暴君，反右則是一場完全不需要動機的暴力遊戲。

爲了尋找動機，本文因此提出將 1956 年「反冒進」至 1958 年「大躍進」之間的多起重大事件綜合起來思索的構想。雖然在相關史料尚未完全公開的情況下，某些更直接的證據還有待發掘，然而從八大到南寧會議，一年半的時間裡有許多間接線索被留下來，在關鍵證據仍悉數欠奉的狀況下，間接的旁敲側擊是本文能夠將推論組織起來的唯一方法。

依照本文的分析，毛澤東在「反冒進」和八大之後，一度失去對黨的路線和財經決策的指揮權，最後通過反右，毛澤東才終於又在 1957 年 9、10 月間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重新設定理論路線，回到不論是「冒進」或「躍進」的這一條思路上來。沒有這一層轉折，毛澤東日後是無法順利發動「大躍進」運動的。而這一蟄伏與一奮起之間，恰好穿插著反右鬥爭，如果說反右鬥爭與毛澤東最終能夠壓倒八大決議兩者間完全不相干，實在難以令人信服。筆者因此認爲，1956 年至 1958 年之間從「反冒進」到「大躍進」的多起重大政治事件，如果不綜合起來作全盤的考量，則整風、反右、批判反冒

進等等事件，就無法得到整體的理解，只會淪為支離破碎的斷爛朝報。中共官方史書，甚至當代西方有關這段歷史的權威論著，包括 MacFarquhar 對於文革起源的論述，幾乎都免不了這個毛病。<sup>126</sup>通過將反右嵌入到 1956 至 1958 年整體中共高層政治情勢發展的脈絡中來觀察，則不論是陰謀論或「陽謀說」最難解的動機問題乃得以迎刃而解，同時還可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在這段期間內最費人疑猜的幾個謎團，找到一線破解的希望。本文之所以主張反右運動必須往上與反冒進、八大掛鉤，同時連繫到八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批判反冒進、大躍進，最重要的原因便在於如此可以描繪出更為「完整的」毛澤東的心理變化，而諸多斑駁紛亂的歷史圖像，亦可以找到串連的解釋。

當然，如果歷史的真相與本文的結論若合符節，<sup>127</sup>那麼本文除了為毛澤東發動反右鬥爭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外，還將附帶呈現出一個殘酷的事實：55 萬(甚至可能在百萬以上)飽受打擊摧殘的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犧牲得一點價值也沒有。他們之所以遭逢噩運，竟然只為了毛澤東要從劉少奇、周恩來手上把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導權和詮釋權奪回來！簡言之，55 萬人成了權力鬥爭的犧牲品。這種犧牲，還真是輕如鴻毛。

<sup>126</sup>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雖然從 Roderick MacFarquhar 的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一書獲得許多啟發，然而仍不能不對該書第 4 部份有關反右運動的描寫，提出許多質疑。一方面或許由於 1970 年代初期 MacFarquhar 撰寫該書時仍有許多關鍵的文件尚未公開，以致於作者沒有辦法對許多支離破碎的事件進行連貫的理解，但另一方面亦不得不指出由於該書的這一部份內容欠缺統整的解釋邏輯，同時亦無法清楚交待決策脈絡的發展，因而敘述頗顯得零亂紊雜。此外，*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由 Merle Goldman 所撰寫的第 5 章〈黨與知識分子〉，在有關反右運動原因的解釋上，則與中共官方的論述基本相同，即反右的發生是因為知識分子的批評太過露骨，導致毛澤東最後不得不改換心意，進行反擊。

<sup>127</sup> 歷史論述(discourse)與歷史真相(truth)之間的距離，自 19 世紀以來便是一個爭論不休而難以獲致絕對說服力的知識論議題。Edward H. Carr 在 1961 年初對此的看法是：「歷史家和他的事實(his facts)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見 Edward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p. 24. 筆者對 Carr 這句話的理解是：歷史家永遠無法確知他的論述和歷史真相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遠，但是，歷史家必須為他所面對的歷史事實負責，包括判別個別事實之真偽。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文件彙編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7.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鳴」「放」集——大陸知識分子反共言論》，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1957。
9. 不詳，《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出版者不詳，1969。
10. 方君歸主編，《劉少奇問題資料專輯》，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
11. 學習雜誌編輯編，《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彙編·第一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2. 鋼二師武漢大學總部、中南民院革委會宣傳部、武漢師院革委會宣傳部合編，《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10-1957.12)》，武漢：編者，1968。

### (二) 專書

1. 丁抒，《陽謀——「反右」前後》，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3年增訂版。
2. 千家駒，《從追求到幻滅——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自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編輯部合編，《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年第3版。
6. 王若水，《智慧的痛苦》，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
7.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八卷(1949-195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
8.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九卷(1960-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
9.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1. 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2. 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13.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1。
14. 朱地，《1957年的中國》，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
15.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16. 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17. 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1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19. 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詞》，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
20. 吳冷西，《憶毛主席》，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21.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22. 高化民，《共和國年輪·1955》，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3.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
24.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2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26. 陳清泉、宋廣濤，《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27.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28. 葉永烈，《反右派始末》，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29. 傅敏編，《傅雷家書》，香港：三聯書店，2006。
30. 楊勝群、陳晉主編，《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紀實》，北京：三聯書店，2006。
31. 趙志超，《毛澤東十二次南巡》，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32. 劉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長編·第二卷(1957-1965)》，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33.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版。
34.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新華出版社，1998。
3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3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37. 蕭冬連、謝春濤、朱地、喬繼寧，《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
38.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3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三) 期刊論文

1. 羅冰，〈反右運動檔案解密——實劃右派3百多萬！〉，《爭鳴》(香港，2006.01)，頁8-10。

### (四) 學位論文

1. 李福鐘，〈新民主主義時期(1949-1956)中國共產黨的私營工商業政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 (五) 報紙

1. 〈不平常的春天〉，《人民日報》，1957年6月22日，1版。
2.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日報》，1957年6月19日。
3. 費孝通，〈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

## Doubts and Reassessment to the Causes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 Rethinking the Beijing Politics, 1956-1958

Li, Fu-chu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year 2007 happens to be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break out of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in 1957. In this large scale political persec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dmitted that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d been suffered various kinds of oppression, including degradation, throwing into labor camps, or even execu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official claimed that the caus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were the intellectuals' furious attack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later was forced to fight back. Such way of statement might be labeled as the "fighting-back theory".

But there was also an accusation which blamed Mao Zedong as the greatest conspirator, because Mao happened to be who encouraged the intellects to break their silence, and also who launched the whole campaign. This stand could be called as the conspiracy theory.

But which theory hold the truth of the histo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point out the unreasonable doubts of the "fighting-back theory". In fact, the situ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contending and blooming"(鳴放) had been firmly under Mao's control. There was no turmoil, nothing out of control, no signs would show that the Hungarian Revolt in 1956 could happen in China. More than that, Mao thoroughly understood the "contending and blooming" policy would sooner or later bring out the intellectuals' reproaches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 Why Mao insisted to take such a vengeful persecution, just couple of weeks after he invited the intellectuals to criticize the

communist part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scribe Mao's whole plan as trying to reverse the policy guidelin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ight Congress which Mao unquestionably discontended but had no reason to object. Only by such explanation, Mao's motive will eventually be unveile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not only as a clueless conspiracy, but a delicate tactics to push the leading officials to march into Mao's plot fo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in 1958.

**Keywords:** anti-rightist campaign, Mao Zedong, fighting-back theory, contending and blooming